

RAFIQ DOSSANI, LYNN HU, CHRISTIAN CURRIDEN

中国通过国际组织 实施其亚洲大战略

探索性分析



如需了解更多有关本出版物的信息, 请访问网站 www.rand.org/t/RRA1653-1。

兰德公司介绍

兰德公司是一家研究机构, 专门针对公共政策挑战制定解决方案, 从而提升全球各个社区的安全、健康与繁荣。兰德是一家非营利性的无党派机构, 致力于维护公共利益。如需了解更多关于兰德的信息, 请访问网站 www.rand.org。

研究诚信

我们坚持品质与客观的核心价值观, 并坚定不移地践行最高水平的诚信和道德行为, 这为我们的使命提供了支持, 让我们能切实做到通过研究和分析帮助改善政策和决策。我们的研究出版物遵循健全而严格的质量保证流程, 从而确保我们的研究和分析缜密、客观、不偏不倚; 通过员工培训、项目筛选和强制披露政策, 避免表面的和实际的财务冲突和其他冲突; 坚持公开发表研究成果和建议, 披露出版研究的资金来源, 实施确保知识独立的政策, 从而实现研究活动的透明性。如需了解更多信息, 请访问网站 www.rand.org/about/principles。

兰德的出版物不一定代表兰德研究的客户和赞助商的意见。

由加州圣塔莫妮卡兰德公司出版

© 2021 RAND Corporation

RAND®是一个注册商标。

美国国会图书馆图书在版编目数据提供了本出版物的相关数据。

ISBN: 978-1-9774-0820-4

封面: 棋局: ChrisAt/Getty Images/iStockphoto。地图: pc/Getty Images。棋子: TheUltimatePhotographer/iStockphoto。

封面设计师: Rick Penn-Kraus

有限的纸质版与电子版分发权利

本文件及本文件中包含的商标均受法律保护。本文件代表兰德的知识产权, 仅用于非商业用途。如无授权, 禁止在网上公布本出版物的内容。仅允许出于个人使用的目的复制本文件, 但前提是不得进行任何修改, 且文件必须完整。如需出于商业目的复制或以其他方式重复使用兰德的任何研究文件, 必须得到兰德的许可。如需了解有关重印和链接许可的信息, 请访问网站 www.rand.org/pubs/permissions。

关于本报告

本报告研究了中国如何通过国际组织来实施其在亚洲的大战略。为此，我们首先回顾了有关中国大战略、国际组织使用情况及其将亚洲视为重心的相关文献。然后，我们咨询了政策专家，讨论了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在其利益相关的事务上实施大战略时的国际组织使用情况，并以朝鲜半岛国家为例进行了案例研究。

我们的研究得出了以下结果：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大战略始终遵循着一个长期目标，即在社会经济、外交和国防领域成为亚洲首屈一指的大国，并发展成为全球大国。要实现这一目标，中国目前需要取得三项成果：(1) 加深与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一体化程度，(2) 应对与美国的竞争，以及 (3) 打造全球软实力。

在过去 30 年里，随着中国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其期望值也发生了变化。中国实现期望成果的战略也在不断演变。其中一项主要的战略变化是，中国开始越来越多地利用多边、区域性和双边国际组织来解决在社会经济、外交和国家安全方面遇到的有关中国利益问题。中国发现，区域性和双边国际组织对其在亚洲地区实施战略尤为重要。

在案例研究中，我们发现中国主要利用国际组织来加深其与北朝鲜和韩国的经济一体化程度。中国同时使用国际组织和非国际组织的行动计划处理其在朝鲜半岛与美国的竞争关系，同时打造软实力。我们从这些结果中得出了一些启示，既涉及中国以国际组织为基础的战略的充分性，也涵盖了中等国家的应对。

兰德国家安全研究部 (RAND National Security Research Division)

该研究由韩国国际交流财团的政策导向型研究项目赞助，由兰德国家安全研究部 (NSRD) 的国际安全和国防政策中心实施，该研究部负责运营国防研究所 (NDRI)。国防研究所是一个联邦资助的研发中心，由国防部长办公室、联合参谋部、联合作战司令部、海军、海军陆战队、国防机构和国防情报中心提供资金支持。

有关兰德公司国际安全和国防政策中心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rand.org/nsrd/isdp 或联系主任（联系信息请见网页）。

致谢

作者感谢韩国国际交流财团提供的支持。我们要感谢所有受访者能抽出时间，慷慨作答，分享他们对这一难题的真知灼见。最后，感谢本报告的审稿人 Cortez Cooper、Andrew Scobell 和 David Shambaugh，感谢他们花费时间和精力贡献自己的专业知识。

总结

中国经济在飞速增长，随之而来的是中国膨胀的区域和全球抱负。中国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实现其雄心壮志，包括推动制定新的行动方案和国际组织。例如，投资高达数万亿美元的“一带一路”（BRI）行动方案，该行动计划依照宪法指示制定、受中国领先国际组织的支持，由中国出资，旨在建立一系列陆海基础设施走廊，将中国与亚洲和欧洲连接起来，推动中国承担起提供发展融资的核心职责——该职责历来由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承担。

其中几个行动计划或许能够实现多项成果。例如，“一带一路”走廊除了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资金外，还可以让中国经济与发展中国的经济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如果目前主要的海上运输路线因战争而被封锁，中国仍然可以通过其陆地走廊将货物运输到亚洲和欧洲。

近年来，中国选择推动或积极参与大量全新国际组织和行动计划，这表明，中国的大战略已经发生了演变。什么是大战略？它如何使用国际组织，它对亚洲有哪些影响？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首先综述了有关中国大战略、国际组织使用情况及其将亚洲视为重心的相关文献。然后，我们咨询了政策专家，讨论了中国在与自身利益相关的亚洲国家实施大战略时的国际组织使用情况，并以朝鲜半岛国家为例进行了案例研究。

我们发现，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大战略始终遵循着一个长期目标。即在社会经济、外交和国防领域成为亚洲首屈一指的大国，并逐渐发展成为全球性大国。要实现这一目标，中国目前需要取得三项成果：(1) 加深与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一体化程度，(2) 管理与美国的竞争，以及(3) 打造全球软实力。

在过去 30 年里，随着中国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期望成果也发生了变化，彼此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远超以往。首先，与以往来将战略重心局限在东南亚和东北亚相比，中国现在的战略重心覆盖了整个亚洲。这种变化是由经济需求（如获得矿产资源）和安全需求（如确保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边境安全）驱动的。

第二个变化是，对亚洲和全球而言，经济一体化业已经取代贸易开放。这种变化主要通过外商直接投资（FDI）实现，目前中国在这方面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第三，由于与美国的竞争关系愈发激烈，中国需要管理这种竞争关系，而不能同以往一样将美国发展成贸易和战略对话伙伴。在中国大战略中，存续长达几十年的

“美国因素”带来的影响仍然十分严重，但维度已经扩展到新的领域，如亚洲海域的海上竞争，以及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抵消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

第四，中国寻求在全球范围内参与软实力竞争，而早些时候，中国在这方面的目标还局限于发展中国家。

中国实现期望成果的战略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其中一个主要变化是，中国开始更多地使用国际组织。冷战期间，中国采用了以生存为导向的方法，该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一种非国际组织的方法，但在这之后，中国开始更加积极地（但虽然不完全如此）利用国际组织来解决中国在社会经济、外交和国家安全层面遇到的有关国家利益的问题。这些国际组织往往具有多边性、区域性和双边性，既包括中国参与之前业已存在的国际组织，也包括新国际组织。后者包括中国发起或共同推动的国际组织，有时会与现有国际组织存在竞争关系。中国发现，区域和双边国际组织对其在亚洲地区实施大战略尤为重要。

在案例研究中，我们发现中国主要利用以国际组织为基础的战略来加深与北朝鲜和韩国的经济一体化程度。中国同时使用国际组织性和非国际组织性行动计划管理其在朝鲜半岛与美国的竞争关系，同时打造软实力。

对于韩国这样的中等实力的亚洲国家来说，中国大战略构成了重要问题。这些问题迫使这些国家不得不选择是与中国经济国际组织合作，还是实现本国经济多元化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选择接受中国的主导地位，满足安全需求，还是组建自己的联盟。

目录

关于本报告	iii
总结	v
图表和表格	ix
第一章	
引言	1
本报告的组织	3
第二章	
定义大战略	5
第三章	
中国大战略 - 对国际组织的依赖与日俱增	9
中国期望成果的变化	16
中国的目标和计划汇总	17
主题专家见解	19
第四章	
中国大战略和朝鲜半岛	29
第五章	
结束讨论	37
附录	
A. 主题专家抽样说明	41
B. 术语	43
缩写	45
参考文献	47

图表和表格

图表

图 3.1	1946 年至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的情况.....	15
-------	-------------------------------	----

表格

表 2.1	一些关键的国际组织和非国际组织性行动计	7
表 3.1	截至 2021 年的中国大战略	17
表 3.2	中国自 1999 年以来推动或共同推动的国际组织和行动计划.....	18
表 3.3	关键的国际组织性和非国际组织性行动计划与相应结果的对应关系	20
表 3.4	专家眼中亚洲地区和国家对中国的重要性排名	22
表 3.5	专家眼中中国目标与亚洲国家/地区和中国的国际组织性战略之间的 对应关系	26
表 4.1	中韩朝三国的共同目的	32
表 4.2	中国在朝鲜半岛实施的大战略	35
表 A.1	主题专家特征.....	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与东南亚和东北亚国家经济一体化的程度不断加深，中国的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¹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在区域和全球的雄心抱负早已不再局限于经济一体化，而是往提升技术、外交、文化和军事实力方面扩展。

我们能否通过以上种种雄心抱负在社会经济、软实力、外交和军事行动方面的表现，总结出一个旨在促使中国获得大国地位的独特大战略？近年来，中国选择推动或积极参与大量全新国际组织和行动计划（见第三章表 3.1），这表明，中国的大战略已经发生了演变，本探索性研究对该演变过程进行了探讨。

我们发现，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的大战略始终遵循着一个长期目标。即在社会经济、外交和国防领域成为亚洲首屈一指的大国，并逐渐发展成为全球性大国。要实现这一目标，中国目前需要取得三项成果：(1) 加深与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一体化程度，(2) 处理与美国的竞争，以及 (3) 打造全球软实力。

在过去 30 年里，随着中国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期望成果也发生了变化，彼此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远超以往。首先，与以往将重心局限在东南亚和东北亚相比，中国现在的重心覆盖了整个亚洲。这种变化是由经济需求（如获得矿产资源）和安全需求（如确保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边境安全）驱动的。

第二个变化是，对亚洲和全球而言，经济一体化业已经取代贸易开放。这种变化主要通过外商直接投资 (FDI) 实现，目前中国在这方面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第三，由于近年来与美国的竞争关系愈发激烈，中国需要更好地处理这种竞争关系。冷战结束后，中国在安全方面的担忧主要来自于单极世界赋予美国的权力。由于不断扩大的贸易关系和定期战略对话，两国同意于 1997 年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自此，中国确立了美国的合作伙伴地位。在奥巴马政府当权期间，这种战略合作伙伴

¹ 有关此术语和其他关键术语的定义，请参见术语表（附录 B）。

关系开始转变为一种更具竞争性的关系，这导致中国采取了新的战略，比如在亚洲与美国开展海上竞争。

第四，中国目前寻求在全球范围内参与软实力竞争，而早些时候，中国在这方面的目标还局限于发展中国家。

中国实现期望成果的计划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其中一个主要变化是，中国开始更多地使用国际组织来制定新制度。冷战期间，中国采用了以生存为导向的方法，该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一种非国际组织的方法，但在这之后，中国开始更加积极地（但不完全如此）利用国际组织来解决中国在社会经济、外交和国家安全层面遇到的有关国家利益的问题。这些国际组织往往具有多边性、区域性和双边性，既包括中国参与之前业已存在的国际组织，也包括新国际组织。后者包括中国发起或共同推动的国际组织，有时会与现有国际组织存在竞争关系。

中国发现，区域和双边国际组织对其在亚洲地区实施大战略尤为重要。例如，中国于 2013 年提出了“一带一路” (BRI) 行动计划，这是一个依照宪法指示制定、受国际组织支持的万亿美元行动计划，旨在通过铁路、电力和其他基础设施连接，将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及世界各国相连（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13；新华社，2017）。

“一带一路”行动计划已经显现出帮助贫困国家加快发展的潜力，让中国稳稳地站在世界金融的中心。2020 年，美国承诺为海外基础设施项目提供 15 亿美元资金（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未注明日期）。相比之下，仅通过“一带一路”行动计划，中国每年的海外基础设施支出约为 400 亿美元，中国承诺的投入超过 1 万亿美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2018 年）。

亚洲是“一带一路”资金的最大接受方，占比 54%，非洲仅随其后，占比 27%。接受“一带一路”投资的主要亚洲国家有巴基斯坦、越南和印度尼西亚，而非洲接受投资的主要地区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Nedopil, 2021）。以上国家全部为发展中国家。随着“一带一路”的成功，中国似乎正在实现一个重要的软实力目标，即成为公认的全球南方的捍卫者。

“一带一路”亦有助于实现另外两项成果。例如，“一带一路”走廊可以让中国经济与发展中国的经济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如果目前主要的海上运输路线因战争而被封锁，中国仍然可以通过其陆地走廊将货物运输到亚洲和欧洲。

上海合作组织 (SCO) 是中国以国际组织为基础的战略的另一个典型范例，该组织是一个具有社会经济、外交、反恐和军事目标的区域政府组织 (SCO, 未注明日期)。SCO 由中国倡议，于 2001 年成立，截至 2021 年已有 9 个成员国。成立初期，该组织即在反恐和边境问题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功。反恐仍将是 SCO 的一项重要活动。正

如一份 2020 年的宣言所述，SCO 重点关注的新领域包括就地区和邻国（如叙利亚）的安全问题建立外交共识，以及“塑造多极世界秩序”的必要性 - 这两个声明无不表明了其在管理中美（俄美）关系方面所做的努力（Al-Qahtani, 2006; 大西洋理事会, 未注明日期; SCO, 未注明日期）。SCO 是否是中国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考虑到中国的规模、经济和军事实力及其与亚洲几个国家（尤其是东北亚和东南亚国家）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中国的大战略可能会对该地区产生影响。这就引出了以下问题：什么是中国大战略？这个大战略在亚洲有何表现，会产生什么影响？其他亚洲国家对中国大战略的反应如何？

本报告的组织

我们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法如下。我们首先回顾了大战略相关文献（第二章），重点介绍中国大战略、中国对国际组织的使用以及中国对亚洲的重视（第三章）。然后，我们咨询了政策制定和学术界专家，了解中国在其感兴趣的亚洲国家实施大战略时的国际组织使用情况（第三章）。最后，我们对中国大战略对朝鲜半岛的影响进行了案例研究（第四章）。在第五章，我们对研究结果进行了总结。

定义大战略

借鉴 Goldstein (2020) 的思路,¹ 我们将大战略定义为国家借助特定资源, 制定相关时间表, 从最高层面协调和引导国家资源, 以实现某些国家目标的国家计划。

大战略拥有三个主要特征 (Silove, 2018)。首先, 它具有长期性。正如 Paul Kennedy (1991) 所说, 大战略是“可以运行几十年乃至几百年的政策的演变和整合 (第 4 页)。”这表明, 大战略目标应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

大战略的第二个特点是具有整体性和综合性, 涉及一个国家的所有资源 (Hart, 1967)。用一个比较现代化的词语来形容就是“全政府战略”, 它涵盖国家的军事、外交、技术和经济资源。

大战略的第三个特点是它的目的在于促进国家安全, 即 Makinda (1996) 所说的“维护国家领土和对外主权完整” (第 152 页), 或 Posen (2003) 所说的“维护一国的全球‘权力地位’” (第 8 页)。

对于中小国家来说, 它们的大战略需要体谅大国利益。例如, 朝鲜战争 (1950–1953) 结束后, 韩国偶尔尝试与北朝鲜统一, 却始终因 1953 年与其签订盟约的盟友——美国 (一个强权国家) 的行动而受到影响。冷战期间, 美国采取行动, 遏制北朝鲜的盟友——苏联, 这实际上阻碍了朝韩统一的步伐。自 1992 年以来, 朝韩统一被重新提上日程, 却始终阻碍重重, 部分原因在于美国担心北朝鲜核武器带来的威胁 (Wit, 2001)。²

即使是对大国来说, 自治也并非能绝对自治, 除非其拥有单极强权。正如 Scobell 等人 (2020, 第 6 页) 所说, 大国的大战略往往与自身同其他国家的主观或实际竞争

¹ Goldstein (2020, 第 166 页) 将大战略定义为“一个国家为确保切身利益和追求自身目标而采取的政治、外交、经济和军事手段”他进一步指出, “大战略之所以与众不同, 部分原因在于它的范围很广, 是对一个政权的首要任务以及如何利用各种政策工具来完成这些任务的总体构想。”

² 当然, 在针对重新统一展开广泛的讨论时, 核裁军只是其中一个讨论因素。即使达成核裁军协议, 朝韩两国特有的政治、经济和其他因素也仍可能发挥重要作用。

关系交织在一起。例如，冷战期间，苏联和美国这两个国家的大战略就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每个国家都需要保障自己的地区和全球安全利益，但其战略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手国的大战略。虽然大战略不需要对手或敌人，但有一种观点认为，“从历史角度来看，正因为存在需要对抗的敌人，才需要制定国家战略”（Sibii，未注明日期）。

国际组织的使用是大战略的一个重要表现。North（1991，第 97 页）将国际组织定义为“人类设计的、建构了政治、经济和社会互动的约束”。国际组织既制定非正式约束（制裁、禁忌、习俗、传统和行为规范），也制定正式规则（宪法、法律、产权）。”

国家和多边国际组织有助于各国实现其长期目标。例如，美国即通过国家机构（如美国国际开发署）以及多边国际组织（如联合国 (UN) 援助机构）实现提供对外援助的长期目标。为应对 2019 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宣布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 5,000 万美元的援助，此外还宣布通过本国机构 - 主要是于 2018 年成立的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提供约 30 亿美元的援助（CIDCA，未注明日期；Ravelo，2017；Rudyak，2019；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1）。

尽管国际组织并非实施国家计划的唯一途径，但与非国际组织性方法相比，国际组织具有如下优势（Zucker，1983；North，1991）：

- **对目的和规则的长期承诺：**国际组织迫使成员国在规则的约束下作出有关国际组织目的的长期承诺。因此，通过国际组织的约束，成员可以将自己塑造成负责任的长期参与者。成员当中受国际组织约束的小国也不会对大国行使权力的方式感到担忧。
- **专业知识：**国际组织能孕育出一个比特定领导层更长久的专业知识库。
- **标准制定和透明度：**只要其他国家符合国际组织的标准和规则，国际组织就允许这些国家加入。这可以帮助新成员国提升标准，同时也有助于汇集专业知识和资源。
- **公共品的管理：**在 多边国际组织方面，此类国际组织可以帮助成员国履行对环境等全球公共品的集体责任。

当然，与非国际组织性方法相比，国际组织也并非毫无缺点。非国际组织性行动计划的主要优点如下：(1) 无需占用长期资源，即可**实现短期目的**；(2) 仅向预先确定的利益相关方授予**成员资格**，以便快速组织联盟；及 (3) 用新方法与新合作伙伴**开展实验**，成为国际组织化的先行者。表 2.1 显示了著名的国际国际组织和非国际

表 2.1

一些关键的国际国际组织和非国际组织性行动计划

国际组织名称	国际组织类型	目的类型	优势
国际组织性行动计划			
联合国及其机构	多边	外交、社会经济和安全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对目的和规则的长期承诺 专业知识 标准制定和透明度 公共品的管理
WTO	政府间和全球	经济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对目的和规则的长期承诺 专业知识 标准制定和透明度
WB, IMF	政府间和全球	经济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对目的和规则的长期承诺 专业知识 标准制定和透明度
ASEAN	政府间和区域	外交和社会经济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对目的和规则的长期承诺
SCO	政府间和区域	外交、社会经济和安全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对目的和规则的长期承诺
NATO、ANZUS、里约协定	政府间和区域	安全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对目的和规则的长期承诺
安全条约 - 美日、美韩、美菲、美泰	政府间和双边	安全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对目的和规则的长期承诺
非国际组织性行动计划			
意愿联盟	政府间和全球 (非正式)	安全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实现短期目的 限制成员制
四方安全对话	政府间和区域 (非正式)	外交、安全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限制成员制 国际组织化的先行者
自由开放的印度 - 太平洋地区	政府间和区域 (非正式)	外交、安全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限制成员制
G7	政府间和全球 (非正式)	外交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限制成员制
BRI	政府间、双边 和区域	经济和外交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国际组织化的先行者

组织性行动计划的示例以及二者各自的目标和优势（Kastner, Pearson, and Rector, 2018; Johnston, 2014）。

表 2.1 中列出的国际组织性行动计划和非国际组织性行动计划的区别在于是否遵守正式的参与规则。例如，东南亚国家联盟 (ASEAN) 受东盟宪章管辖，该宪章定义了成员范围、目的和运作模式。相比之下，没有自己网站的七国集团 (G7) 属于非正式协会，其成员基于共同的价值观聚集在一起。与受规则约束的实体不同，这些价值观并未正式定义成员的范围，亦未具体说明目的和运作模式（ASEAN，未注明日期；G7 英国，未注明日期）。

国际组织的优势使其成为国家战略工具包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下一章中，我们将介绍中国的大战略，并讨论中国的国际组织使用情况。

中国大战略 - 对国际组织的依赖与日俱增

在本章中，我们将重点介绍中国大战略的目标、期望成果和计划，及其在中国和全球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的目标始终没有改变，但目标的实现需要中国对期望成果、新战略和新计划做出重大改变。

当前的文献普遍呈现出这样一个观点，正如 Scobell 等人 (2020) 所说，中国目前的“核心目标是到 2050 年建立一个治理良好、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技术先进、军事强大的中国。”（第九页）。或者如 Goldstein (2020) 所说，从冷战结束到现在，中国大战略的“持久目标”是“实现复兴，恢复中国先进国家和大国的地位”（第 169 页）。

在冷战期间，中国的目标更为保守：“面对来自超级大国的紧迫威胁，北京的首要挑战是确保国力相对薄弱的中国的安全”（Goldstein, 2001, 第 835 页）。当时中国国力薄弱源于文化大革命 (1966–1976) 期间的经济崩盘。早先，中国选择了与苏联结盟以解决安全问题（Goldstein, 2001）。20 世纪 60 年代中苏同盟关系破裂后，中国寻求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以保护自身免受苏联的影响（Kraus, 2020）。1972 年，随着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合法地位，中美开始正式交往。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彼时，中国与苏联之间的裂痕已经愈合。

自 1979 年以来，中国的重心一直放在本国的发展上。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进行了几项改革，开放了中国市场，使中国经济逐渐转型为市场经济。在此期间，尽管存在一些重大的外交政策挑战，比如 1989 年天安门广场平息暴乱事件带来了严重后果，但中国在专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妥善处理。

冷战结束后，中国在安全方面的担忧主要来自于单极世界赋予美国的权力。Goldstein (2001, 第 840 页) 写道，

北京最近面临的最严重的安全问题是来自敌对国美国的潜在威胁。敌对国苏联解体后，美国不再受到任何制约……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随意进行反复的军事干预。最令人担忧的是，美国决定向中国台湾地区附近派遣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作为对 1995 年至 1996 年中国采取强制性外交政策打击台湾分裂势力的回应。

同样，Freeman 也讨论道，中国对美国的关注是促使中国做出某些战略应变的原因（Freeman, 2018; Freeman, 2020）。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1989 年天安门广场平息暴乱事件带来的阴影开始淡化，中国的正面表现开始吸引美国的注意。1994 年，美国时任总统克林顿呼吁加强与中国的经济接触（Goldstein, 2001）。中国迎来了更多经济往来的机会，但仍将敌对国家——美国的威胁视为影响国家安全的主要因素（Goldstein, 2001）。

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中国开始积极践行多边主义，部分原因是希望改变国际社会对中国与日俱增的国力持有的怀疑与批评态度。例如，中国于 1996 年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但与美国一样，中国尚未批准该条约）。中国从 2000 年开始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此外，它还将美国培养成战略伙伴，因此，1997 年，双方同意建立战略伙伴关系（Goldstein, 2001）。之后，在美国的支持下，中国于 2001 年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Prime, 2002）。在接下来的十年里，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美国和中国的经济联系变得更为紧密，这一点在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数据（美国人口调查局，未注明日期）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根据 WTO 协议，中国在外商直接投资规则方面做出了重大让步，首次允许外商独资企业在中国多个领域开展业务。在银行、农业和汽车领域，中国继续放宽对上述规则的限制（Long, 2005）。因此，中美贸易量大幅增长，从 2001 年的每年 2000 亿美元（进出口总额）上升到 2018 年的 7300 多亿美元（包括商品和服务贸易），2019 年下降到 6,350 亿美元，2020 年再次上升至 6,600 亿美元（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未注明日期）。

2009 年，中美两国启动了年度战略与经济对话。当时，“G-2”（即美国和中国共同设计和指导新世界秩序）和“中美国”等新词不绝于耳，但中国官员较为抵触（Lee, 2018）。2009 年 7 月，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会见中国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时指出，“中美关系将影响 21 世纪的格局，这意味着中美关系与全球任何双边关系同等重要”（奥巴马, 2009）。早在 2009 年 2 月，正值金融危机之际，美国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访问中国前指出，尽管“有些国家认为日渐崛起的中国从定义上来说将不啻于一个劲敌……但我们相信，美国和中国可以从彼此的成功中受益，并为对方的成功做出贡献。”（克林顿, 2009）

因此，冷战的结束迫使中国对部分大战略成功做出改变。这种重大变化主要体现在中国的核心目标上，随着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增长，中国将重心从生存转移到“复兴”或恢复历史大国的地位上（Goldstein, 2020, 第 169 页）。

Wang (2011) 指出，冷战结束后，中国一如既往地关注经济发展。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及中国领导人邓小平 1978 年推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未停止对经济的关注 (Scobell 等人, 2020, 第 11 页)。

将发展重心放在亚太地区也表明中国对该地区的兴趣上升。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中国的发展十分依赖亚洲的供应链（美国在亚洲采取行动给中国带来安全担忧，导致中国对该地区的依赖有增无减），因此，在 21 世纪的头十年，中国的地缘战略重心牢牢锁定在亚洲，其中以东北亚和东南亚最为突出。而对于亚洲其他地区，中国并未倾注过多精力，因为中亚和南亚国家与中国的联系并不紧密。中亚和南亚国家的经济不像东北亚和东南亚国家那样充满活力和具有前瞻性，在中国看来，这些地区缺少潜力 (Wang, 2011)。

但是，在胡锦涛主席的领导下 (2002–2012)，中国政府开始反思其对亚洲其他地区的态度。Wang (2011, 第 78 页) 指出，

十多年来，中国中央政府一直在西部多个省份和地区实施西部大开发计划，其中西藏和新疆为重点开发省份。目前，中国更积极地在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中亚、里海地区乃至欧洲发起并参与新的开发项目。这种全新的西方布局可能会重塑中国的地缘战略愿景以及欧亚大陆的格局。

在胡锦涛执政之前，中国主席江泽民 (1989–2002) 推动中国与俄罗斯以及中亚邻国开展合作。此番合作衍生出一个非正式组织“上海五国”，该组织在解决边境争端和边境去军事化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功。2001 年，该组织正式命名为上海合作组织 (SCO)。在 Doshi (2021, 第 126 页) 看来，管理与美国的竞争关系是中国和俄罗斯推动 SCO 发展的一个关键目标。

从冷战时期到冷战结束后的前二十年，中国大战略的变化可以概括如下：(1) 主要目标从生存转为复兴，以便在社会经济、外交和国防领域成为亚洲首屈一指的大国，并逐渐发展成为全球大国；(2) 仍保留管理中美关系这一目标，但在中国战略方面有所扩大，包括开放贸易关系、参与多边国际组织，以及正式确立美中战略伙伴关系；(3) 仍保留经济发展这一目标，但制定了新计划，即通过贸易开放打开中国的大门，发展区域供应链；(3) 制定了新目标：与东南亚和东北亚建立政治关系，确保供应链稳定；(4) 制定了新目标：通过中国推动的 SCO 组织，与中亚建立安全关系；(5) 继续实现原有目标：通过参与现有多边国际组织，帮助发展中国家培养软实力。

在过去十年里，中国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导致中国大战略发生了改变。2012 年，习近平开始执政，当时中国面临着多项安全挑战。在亚洲和欧亚大陆，中国成功解决了

与多个国家的陆地边境争端。但是，中国台湾的持续自治仍是悬而未决的引爆点，中印边境争议区域亦是如此。在亚洲其他地区，中国与几个东盟国家在南中国海问题方面、与日本在东中国海问题方面、与美国在南中国海和马六甲海峡海上航道的安全问题方面均存在一些未能解决的海事争端。在中国国内，西部的恐怖主义一直是该国面临的最大的安全挑战。

特朗普执政期间的美国给中国带来了最严重的外部安全挑战。美国对华态度日趋强硬（即美台关系出现意外进展，2019-2020年香港发生社会动荡），导致中国面临更加严峻的安全挑战。

但一开始形势并非如此。在特朗普政府执政初期，中国与美国合作，推出有关制裁北朝鲜的行动计划，表明两国将继续保持经济关系和美中战略伙伴关系。这一期望进一步受到特朗普和习近平于2017年商定的“四大支柱”关系的支持，涵盖(1)外交和安全问题、(2)经济问题、(3)执法和网络安全以及(4)文化和社会问题（King, 2017; LUM, 2017）。

但自2017年末以来，形势出现戏剧性逆转。中美关系从主要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竞争转变为在技术和外交等众多其他领域不断升级的安全竞争和对抗（亚洲安全事务专家，2010; Dossani, 2020）。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Cordesman, 2017）。2018年7月，美国发起中美贸易战，中国给予反击，两国之间的贸易战仍在继续。2018年10月，美国提出，中国是导致美国退出与俄罗斯签订的《中程核力量条约》的理由（Javed, 2018; 美国国防部，2018）。2020年1月，中美签署了一项经贸协议，重点更新了中国的知识产权国际组织，同时，中国承诺购买更多美国商品。

美国现在将中国视为其主要竞争对手（国务卿办公室政策规划人员，2020）。拜登政府将中国列为美国“最大竞争对手”，外交政策官员 Kurt Campbell 指出，“与中国接触的时代[已经]结束”（Zheng, 2021）。

中美目前的外交对话仅限于双边行动计划，其中多项行动计划似乎都面临失败。¹部分观察家认为，中美关系的趋势是“修昔底德陷阱”（即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

¹ 中美两国过去和现在的双边行动计划包括：

- 中美外交与安全对话（目前处于暂停状态）
- 中美执法与网络安全对话
- 中美综合经济对话（目前处于暂停状态）
-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已关闭）
- 中美社会与人文对话

统治霸主之间的挑战和对抗日益加剧的环境）的必然结果（Allison, 2017; Holmes, 2018）。这种环境表明，冷战局势可能重现，只不过这次的主角变成了中美两国。

到 2021 年，中国大战略可能会根据以下美国对中国的担忧出现相应调整：

- 中国在南中国海、钓鱼岛和台湾海峡的强硬态度
- 中国从经济层面与美国竞争的能力不断增强；从 2000 年到 2010 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着实出人意料，平均每年增速超过 10%，赋予了中国前所未有的国家实力。截至 2021，中国的储蓄率为 45%，超出美国三倍以上，国内生产总值是美国的 66%（CEIC 数据，未注明日期）。因此，中国每年新增可投资资本总额约为美国的两倍。
- 如果根据贸易总量和供应链整合衡量，中国自 2000 年以来与东北亚和东南亚的经济一体化呈现惊人的发展势头，并且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Kwok 和 Koh, 2017）；如果中国决定退出供应链或以其他方式限制供应链，将会导致美国进口商品短缺，给美国的经济安全带来风险。

请注意，在美国的上述担忧中，对亚洲的担忧尤甚。自美国修改与中国竞争的计划以来，中国采取了以下应对措施。首先，中国寻求“维护本国的核心利益”（Goldstein, 2020, 第 179 页），包括在争议地区彰显自己的存在（Goldstein, 2020）。例如，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地区域建立军事基地，对美国在该区域做出“航行自由”行动、侵犯台湾防空识别区和派遣船只进入钓鱼岛领海的行为表示谴责。

其次，在外交领域，随着美国减少参与或退出联合国及其机构（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世界卫生组织 [WHO]）、WTO 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等关键国际组织，中国开始寻求加强与上述国际组织的接触。中国将上述行动计划视为成功之举（Doshi, 2021, 第 109 页）。因为这“从长远来看，有助于在更广泛的国际组织层面提升中国的权威和削弱美国的权威”（Ikenberry 和 Lim, 2017）。Doshi（2021, 第 108 页）指出，作为大战略的一部分，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组织，从而说服其他成员相信中国释放的“善意”，因为中国必须遵守规则才能加入国际组织。如果美国属于该等国际组织的成员，上述倡议不仅能削弱美国的威信，而且能成为中美关系后

-
- 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已关闭）
 - 中美人权对话（目前处于暂停状态）
 - 中美气候变化对话（正在进行）

续下滑的一种缓冲。中国可能还有意削弱由美国担任主要成员的国际组织（Doshi, 2021）。²

并非所有学者都认为，中国外交战略的主要目的是解决与美国的竞争关系。还有一种比较温和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外交战略也是为了支持中国“睦邻友好”的目标。Scobell 等人 (2020) 表示，“根据国家复兴大战略，中国正在重新平衡外交战略，不仅要与美国和其他大国保持良好关系，还要增进与中国周边邻国及整个发展中世界的关系”（第 37 页）。

中国长期以来一直践行多边主义，除此以外，中国还越来越多地通过联合国参与多边国际组织，这不仅出于对本国安全的考虑，更为了彰显自身软实力。自 1971 年正式加入联合国并取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以来，中国一直积极开展国际组织相关工作。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将自身视为发展中国家在安理会的代表。过去 20 年里，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国开始更广泛地通过联合国来运用自身的软实力。中国是联合国预算的第二大出资国，仅次于美国，同时也是联合国多个社会福利国际组织的重要出资国（Ikenberry 和 Lim, 2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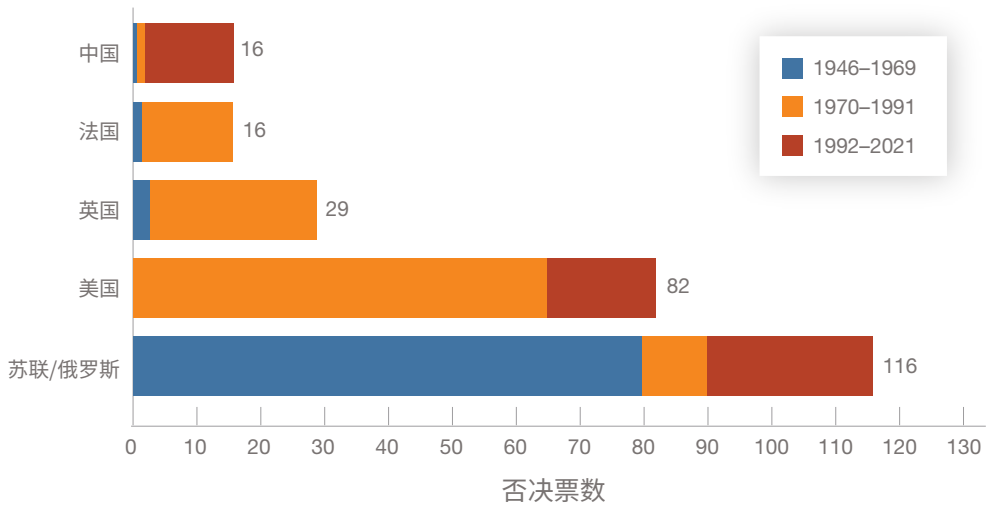
近年来，中国开始在安理会行使否决权，反映出其在外交权力方面不断增长的野心（见图 3.1）。冷战结束后，中国于 1997 年首次行使否决权，此次否决涉及了危地马拉的人权问题。近年来，中国行使的大部分否决权都与叙利亚问题有关，通常与俄罗斯共同行使，对抗美国。此外，中国还否决了关于缅甸和津巴布韦的决议（联合国，2021）。³

第三组应对措施体现在社会经济领域。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继续关注本国经济增长。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打造可与美国抗衡的国家实力，这对于管理中美国之间更加激烈的竞争关系至关重要。此外，经济高速增长还有助于实现强化政权合法性的关键国内目标。国家实力对于习近平主席于 2013 年最新提出的“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至关重要（引自 Ikenberry 和 Lim, 2017）。

² Doshi (2021, 第 103 页) 认为，中国加入某些国际组织（如 1991 年加入亚太经济合作论坛）主要是为了削弱美国的影响力。直到 2007-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国认为作为全球大国的美国正在衰落，不会针对金融危机采取应对措施，因而才决定推广自己的国际组织（Doshi, 2021, 第 213 页）。

³ 自 1992 年以来，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数量有所减少，原因在于中国此前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即中国将针对任何不同意的决议投出否决票，但仅管如此，相关数据表现得也不是很明显。

图 3.1
1946 年至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的情况



来源：UN，2021。

经济高速增长还可帮助中国通过在亚洲发展中国家及其他地区发展软实力，对抗美国。在 2014 年的一次讲话中，习近平指出，“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赋予] 中国为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提供更多公共品的能力和意愿”（Ikenberry 和 Lim，2017）。

随着中国积极参与多边国际组织，中国还推动或共同领导签订新的协定、成立新的国际组织，其中多项协定和国际组织的社会经济任务均以亚洲为重心（见表 3.1）。针对亚洲的行动计划包括 1999 年成立的 ASEAN+3，2014 年成立的金砖五国 (BRICS) 银行（现称为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Kondapalli，2020），以及 2020 年制定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上述所有行动计划均以经济增长为目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IB) 亦是如此，该银行的业务范围主要在亚洲，但也不完全局限于该区域。截至 2021 年，AIIB 拥有 103 个成员国，相比而言，亚洲开发银行 (ADB) 拥有 68 个成员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各拥有 119 个成员国。

2013 年，中国耗资万亿美元，发起了“一带一路”行动计划，这是中国国际组织性社会经济行动计划发挥作用的重要渠道。“一带一路”是一项由各国政府在区域和双边基础上实施的全球行动计划，主要用于发展铁路和管道等实体基础设施。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NDRC) 在国务院指导下负责管理“一带一路”。NDRC 与伙伴

国家协商确定拟实施的项目；将项目外包给中国实体，其中大部分是负责融资和实施的国有银行和企业，包括分包给当地实体；并监督进展情况（Rolland, 2019）。

尽管官方将“一带一路”描述为一项经济发展行动计划，但它似乎附带实现了另外两个目标。第一，增加了其他国家对中国经济依赖。原因在于，每一条经济走廊都将伙伴国家与中国紧密联系起来。中老铁路就是一个典型示例，这条铁路有望将老挝经济与中国经济紧密联系起来。第二个实现的目标是确保中国在关键地点获得准入，包括西方市场、亚洲供应链，以及中东和中亚矿产资源（海运被封锁的情况下）。正在建设中的中缅皎漂 - 昆明铁路也是一个例子。铁路建成后，中国将能够绕过马六甲海峡，向主要市场输送货物，并从主要供应商处进口矿产资源。

中国社会经济行动计划的一个特点是，与安全或外交行动计划不同，社会经济行动计划对目标的定义较为狭窄，旨在帮助实施能超越中国社会经济目标的计划。例如，上述“一带一路”行动计划解决了中国自身的发展问题（社会经济目标）、伙伴国的发展问题（行使软实力的外交目标）、与伙伴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安全目标），以及确保获得关键地点的准入（安全战略）。中国之所以采取“一箭多雕”的方式，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其安全和外交行动计划的广度不够，难以满足所有安全和外交需求，因此必须依靠社会经济目标来予以解决。

中国期望成果的变化

上述分析表明，自冷战结束几十年来，中国大战略目标并未出现重大变化。中国长期目标的重点仍然是复兴——恢复中国先进国家和大国的地位。

然而，在过去十年中，中国的期望成果在几个方面均有所演变，现在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更甚以往。首先，与以前将重心局限在东南亚和东北亚相比，中国在亚洲的重心现已覆盖整个亚洲。这种变化是由中国的经济需求（如获得矿产资源）和安全需求（如确保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边境安全）驱动的。

第二个变化是，对亚洲和全球而言，经济一体化业已经取代贸易开放。这种变化主要通过外商直接投资（FDI）实现，目前中国在这方面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第三，由于与美国的竞争关系愈发激烈，中国需要管理这种竞争关系，而不是培养战略伙伴关系。

第四，中国寻求在全球范围内参与软实力竞争，而早些时候，中国在这方面的目标还局限于发展中国家。

第五，中国的战略工具包对国际组织的依赖与日俱增，主要依赖社会经济国际组织，但外交和安全国际组织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

中国的目标和计划汇总

中国目前计划实现三项成果：(1) 加深与亚洲和全球其他地区的经济一体化程度，(2) 管理在亚洲和全球范围内与美国的竞争关系，以及 (3) 打造软实力。

中国实现期望成果的国家计划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演变。其中一个主要变化是，中国开始更多地使用国际组织。冷战期间，中国采用了以生存为导向的方法，该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一种非国际组织的方法，但在这之后，中国开始更加积极地（但不完全如此）利用国际组织来解决中国在社会经济、外交和国家安全层面遇到的有关国家利益的问题。这些国际组织具有多边性、区域性和双边性，既包括中国参与之前业已存在的国际组织，也包括过去十年由中国发起或共同推动的新国际组织，这些新国际组织有时会与现有国际组织产生冲突。

表 3.1 对截至 2021 年的中国大战略进行了汇总。中国 2021 年的国家规划如下：

- 经济计划
 - 自由贸易协定 (FTA)、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 金融国际组织
 - “一带一路”国际组织和项目

表 3.1
截至 2021 年的中国大战略

目标	期望成果 (类型)	实现成果的国家计划	最典型的示例	国际组织性 行动计划 (是 / 否)
在社会经济、外交和国防领域成为亚洲首屈一指的大国，并发展成为全球大国	加强与亚洲和全球的经济一体化（经济）	1. FTA,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1. RCEP (ASEAN)	1. 是
		2. 金融国际组织	2. AIIB	2. 是
		3. BRI	3. CPEC	3. 是
管理在亚洲和全球范围内与美国的竞争关系 (安全)	管理在亚洲和全球范围内与美国的竞争关系 (安全)	1. 双边和区域安全协会	1. SCO	1. 是
		2. BRI	2. 中缅皎漂 - 昆明铁路	2. 是
		3. 通过军事行动捍卫核心利益	3. 在南海填海造地区域建立军事基地	3. 否
在全球范围内参与软实力竞争 (外交)	在全球范围内参与软实力竞争 (外交)	1. 多边和区域外交协会	1. UN	1. 是
		2. 通过坚定外交捍卫核心利益	2. 批评台独主张	2. 否
		3. 人道主义援助	3. WHO	3. 是
		4. BRI	4. 中老铁路	4. 是

- 安全计划
 - 双边和区域安全协会
 - “一带一路”国际组织和项目
 - 通过军事行动捍卫核心利益
- 外交计划
 - 多边和区域外交协会
 - 通过坚定外交捍卫核心利益
 - 人道主义援助
 - “一带一路”国际组织和项目。

中国的国际组织重点十分明确。经济战略最为全面。其中多项战略以最近形成的国际组织为基础，导致很难确定它们的有效性。表 3.2 列出了中国推动或共同推动的国际组织和行动计划，说明了中国社会经济战略的重要性。

表 3.2
中国自 1999 年以来推动或共同推动的国际组织和行动计划

国际组织名称	成立年份	目标区域	目标结果
ASEAN+3	1999	东南亚	• 加强经济一体化
AIIB	2016	全亚洲	• 加强经济一体化
BRI	2013	全球，但记录显示 以亚洲为重心	• 加强经济一体化 • 管理与美国的竞争关系
全面投资协定	2020	欧洲	• 加强经济一体化 • 管理与美国的竞争关系
中非合作论坛	2000	非洲	• 加强经济一体化 • 培养软实力 • 管理与美国的竞争关系
新开发银行	2014	亚洲	• 加强经济一体化
RCEP	2020	东北亚和东南亚	• 加强经济一体化 • 管理与美国的竞争关系
SCO	2001	中亚	• 管理与美国的竞争关系

注：此列表不包括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和双边战略伙伴关系（亦属于国际组织性行动计划）。

中国的国际组织性安全战略（如 SCO）取得了成功；但该战略的使用次数和范围都十分有限，迫使中国选择使用非国际组织性战略或经济战略作为替代方案来实现安全目标。国际组织性外交战略在贫穷国家取得了显著成功，但在那些将中国坚定捍卫国家核心利益的行为视为胁迫的中国南部和东部的周边邻国，中国的坚定外交取得的效果却差强人意（Scobell 等人，2020，第 43 页）。这可能是由于中国未针对东南亚和东北亚制定外交和安全方面的国际组织性机制。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更为稳定，中亚国家不认为中国对它们实施了强制性外交政策，原因可能在于中国未在东南亚和东北亚地区推出类似于 SCO 的国际组织。相反，中国必须采取非国际组织性行动计划，与国际组织性行动计划相比，非国际组织性行动计划的劣势十分明显，或者，中国必须使用旨在实现其经济成果的经济举措来实现外交和安全成果。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大战略在实现自身的安全和外交目标方面存在一些差距？为了讨论中国大战略对亚洲的关注以及可能存在的差距，我们采访了一些主题专家 (SME)。

主题专家见解

在本章的第一部分，我们综述了中国大战略，揭示了中国为了实现其三个目标，将重心放在亚洲（见表 3.1）。为了帮助我们了解哪些国家会受中国大战略的影响以及这些国家可能会如何应对，我们在本探索性研究中采访了来自中国、韩国、其他亚洲国家和美国的 22 名前决策者和政策分析人士。样本抽选程序和代表性见附录 A。

我们首先请专家介绍了中国可以利用的关键多边和区域国际组织性与非国际组织性行动计划，以及中国希望每项举措能实现的成果。我们在文献综述中同样提到了这个问题，并针对双边行动计划补充了一些问题。结果显示在表 3.3 中。

然后，我们询问了在哪些国家实施这些行动计划才能让中国大战略充分发挥作用，以及中国寻求在这些国家实现什么样的特定成果。结果显示在表 3.4 和表 3.5 中。在本章结束时，我们将讨论中国的国际组织使用情况以及国际组织可能产生的效果。

专家对多边和区域行动计划的评估与我们的文献综述（总结见表 3.1）的结果高度吻合。通过表 3.3 所示排名可以明显看出，全球化对中国未来的各个方面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专家认为，联合国是中国践行政府间多边行动计划的主要工具，这与我们之前的讨论如出一辙。Lanteigne (2005) 指出，中国“积极利用 [联合国] 国际组织发展全球大国地位。”正如一位专家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正是通过联合国才发挥出了真正的影响力。

表 3.3

关键的国际组织性和非国际组织性行动计划倡议与相应结果的对应关系

排名	行动计划对实现期望成果的重要性		
	经济	安全	外交
多边行动计划			
联合国及其机构	3	5	4
一带一路	5	5	3
世界贸易组织	4.5	3	1
区域行动计划			
ASEAN	4	4	3
SCO	3	4	5
双边行动计划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3	4	4
中韩自由贸易协定	4	4	1
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2.25	4.5	5

注：第 1 列中包含的行动计划按重要性排名，显示了根据专家对每项行动计划的评分得出的中位数。行动计划对结果类别（经济、安全、外交）的重要性基于专家对各项评分的中位数，满分为 5 分，其中 1 表示最不重要，5 表示最重要。行动计划必须至少有一个结果类别的评分中位数达到 4 分或更高才会被列入该表。ASEAN 包括选择 RCEP 或 ASEAN+3 的专家。

在全球国际组织和行动计划中，构成“一带一路”行动计划的国际组织和项目对中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的重要性仅次于联合国。专家表示，“一带一路”行动计划之所以如此重要，有三个原因。首先，它规模宏大。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述，“一带一路”行动计划覆盖全球七大洲。第二，每个“一带一路”项目的规模都足以影响东道国的增长前景。第三，专家还指出，“一带一路”行动计划对东道国的发展将产生变革性影响，不仅强化了本国的经济增长前景，同时还为许多国家，尤其贫困地区国家的经济增长带来了机遇。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潜在影响有助于提升中国在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执政精英中的外交地位。因此，不出所料，对于“一带一路”给中国的发展和外交带来的好处，专家效益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证据表明，东道国公众对“一带一路”的评价好坏参半，许多人质疑它带来的经济效益、产生的债务成本及对就业产生的影响（Dossani, 2020）。官方的看法则更为积极（中巴经济走廊事务局，未注明日期；Walt, 2019）。文献表明，尽管并非最终结果，但“一带一路”相关项目确实已让东道国在经济和外交方面受益（Azhar 和 Syed, 2017；Rajah, Dayant, 和 Pryke, 2019；Brautigam, 2020）。

WTO 排名第三，主要因为它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好处。在经济领域，作为全球制成品的首选供应国，中国在自由贸易领域享有特殊的利害关系。WTO 适合像中国这样支持自由贸易的国家，中国加入 WTO 后也同样受益匪浅。⁴ 尽管特朗普政府极力遏制，但如前所述，这一行动计划的吸引力仍证明了国际组织性方法的优势。

在安全领域，中国注重建立区域国际组织，例如，与 ASEAN 共同制定“行为准则”、推出 SCO 等。中国双边安全协议的数量也与日俱增。专家普遍注意到中国近年来在东南亚和东北亚采取的坚定外交行为，但他们发现中国实施的国际组织性或非国际组织性行动计划并未体现这一问题。

谈到双边关系，专家表示，俄罗斯是中国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专家指出，中俄两国都是美国的手国，因此，尽管这两个宿敌对彼此始终心怀忌惮，却仍选择在多个问题上加强合作与协调。如图 3.1 所示，两国在安理会的投票结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趋于一致。两国还携手合作，推动 SCO 等区域组织开展工作，并签署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等双边经济协议。

Lukin 2021 年对中俄关系的研究将有关两国关系不断发展的两种解释进行了对比：(1) 对抗美国的权宜联盟；(2) 利益、价值观和世界观的趋同。他认为，两国建立亲密关系的出发点确实是共同对抗美国，时间可以追溯到 2014 年，当时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在美国的坚持下，俄罗斯被八国集团除名。2015 年，两国同意将俄罗斯推动的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行动计划对接 (Liu, 2019)。美国于 2017 年将中国列为其战略竞争对手，因此，中国寻求与俄罗斯建立更紧密的关系。目前两国在几个领域开展的合作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其中包括中国对俄罗斯进行科技投资、欧亚经济一体化、太空合作、俄罗斯向中国出售武器、联合军事演习，以及建立导弹攻击预警系统。Lukin (2021) 总结道：中俄之间日益趋同的利益可能会对两国关系产生有益的长期影响。

专家将中韩经济关系列为中国第二重要的双边关系。自由贸易协定对中韩两国都十分重要，中国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韩国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Kim, 2020)。

⁴ 作为一个供应（净出口国）经济体而非客户（净进口国）国也可能给中国基于国际组织的自由贸易战略带来限制，因为当交易对手国拥有市场支配力时，中国必须接受非国际组织性解决方案。这一点在特朗普和拜登政府时期中国对美国贸易限制的不同回应中表现得十分明显。2018 年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中国未向 WTO 求助，而是回应了美国提出的商定双边贸易协议请求。可以说，这可能给中国带来了国内利益，因为它导致双方采用的贸易和技术获取标准比中国之前遵守的标准更为公平。

《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排名第三，优先于中印关系和中日关系等其他重要关系。专家指出，这个排名反映出中国由来已久的薄弱点，即对北朝鲜作为合作伙伴的可靠性、北朝鲜政权的稳定性、北朝鲜核武库及其对中国经济依赖的担忧。中国获得的回报是，这种关系提升了中国在与韩美两国外交时的外交地位。

有趣的是，2020年的中美贸易协议排名不高，不足以列入双边行动计划清单。这可能反映出，在拜登政府的领导下，该协议的重要性有所下降。

在确定了关键行动计划及其目的之后，我们也力图确定将在哪些国家使用这些行动计划。例如，为了管理与美国的竞争关系，中国会采取哪些行动计划，在哪些国家采取行动计划？我们还请专家就这些国家和行动计划对中国的重要性发表评论，以便具体了解这些行动计划。结果显示在表 3.4 和表 3.5 中。

表 3.4 中关于重要区域的研究结果与我们的文献综述结果一致。东北亚占据极大的优势，乃其中的重点区域。中国第二和第三大贸易伙伴——日本和韩国即位于东北亚。两国都是美国的盟友，因此中国与两国的关系均十分重要，需要加以管理。两者中，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更为重要，但因中日两国在东海领土主权问题方面存在争端，近年来中国一直在扩充军力，因此，较韩国而言，日本更倾向于将中国视为对手国。与韩国相比，日本在东南亚和南亚（尤其是与印度）拥有更为密切的经济和政治关系，而这些地区对中国也十分重要。此外，日本是中国的大型投资来源国，向中国转移了许多重要的制造技术。

在东北亚地区，对中国第三重要的国家是北朝鲜，不乏有之前讨论过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这个原因。台湾地区仅位居第四，考虑到海峡两岸关系中频繁发生的军事行动、统一失败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影响以及中国台湾与美国的密切关系，这个结果有些出人意料、。

表 3.4
专家眼中亚洲地区和国家对中国的重要性排名

地区排名	地区	各地区内的国家 / 地区排名			
		1	2	3	4
1	东北亚	日本	韩国	北朝鲜	台湾地区
2	东南亚	印度尼西亚	越南	新加坡	泰国
3	南亚	印度	巴基斯坦	斯里兰卡	孟加拉国
4	中亚	哈萨克斯坦	俄罗斯	阿富汗	

注：下表显示了专家对请求的回答：“请按各亚洲地区和国家对中国的重要性对它们进行排名。”地区和国家的排名顺序基于专家对各项评分的中位数。我们在请专家按照对中国的重要性对国家 / 地区进行排名时包含了未被正式承认为国家的实体。

专家认为东南亚在各地区中排名第二。东南亚是与中国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尤其是有供应链一体化、贸易、投资和文化交流等因素的加成。此外，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张使得中国必须谨慎处理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Kwok and Koh 2017 年针对东南亚与中国经济一体化进行的研究表明，聚集经济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劳动专业化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此外，中国还通过包括海外中国公民在内的商业网络，以外商直接投资提供国的身份发挥着重要作用（Sargent, 2021）。

尽管印度尼西亚在东南亚事务中所持立场相对消极，但却排名第一，主要原因是该国国土面积辽阔，在经济舞台上也与中国积极接触，最近在 2019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更是如此。此外，该国拥有庞大且极具影响力的华人群体，与中国之间的经济羁绊十分深厚。

越南排名第二，尽管中越关系错综复杂，且往往以敌对关系居多（Huy, 1998）。上述两个国家都由共产主义政权管理。越南接受了中国的大量投资，并将中国视为最大的贸易伙伴。另一方面，近年来，两国在西沙群岛控制权和南海碳氢化合物开采权上冲突不断，越南与美国的防务关系也日益密切。

新加坡排名第三，表明该国是东南亚地区当之无愧的智慧国家。正如一位专家所言，新加坡是东南亚地区的金融和物流中心，该国一直宣称愿意成为中美之间值得信赖的中间方，并同时与中美两国建立起防务关系。新加坡是中国的早期投资者，帮助中国发展工业园区和其他基础设施。

泰国排名第四，反映的是过往的表现与潜在走向，而非当前现实。就在 20 年前，泰国经济十分活跃，仍被视为中国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但自那以后，该国经济停滞不前，对中国的吸引力也不复以往。由于泰国与美国结盟的同时，对与中国建立关系也持开放态度，因此从中国的角度来看，需要慎重对待中泰关系。两国经济联系紧密，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和其他项目在泰国进行了大量投资。

接下来将讨论南亚，南亚对中国的重要性在各地区中排名第三，而印度在南亚地区排名第一，原因如下。印度的市场规模和潜力对中国供应商极为重要，他们当中有很多在印度进行了大量投资。从外交角度来看，印度一直以来对与中国建立密切关系持开放态度。近年来，受到各种国内和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印度开始向美国靠拢。印度与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一起积极参与四方安全对话，而中国将四方安全对话视为反华团体。过去三年中，中印两国在拉达克和洞朗边境的对峙严重损害了两国关系，导致印度禁止中国参与几项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竞标。尽管存在种种摩擦，但中印贸易关系仍在蓬勃发展，中国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

巴基斯坦排名第二，基本上都出于正面原因。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历史关系密切，中国为中巴经济走廊的大量项目提供了资金支持，而该走廊已经开始扭转巴基斯坦的经济局势。巴基斯坦一直处于反恐最前线，有可能破坏中国新疆省的稳定，但同时也是中国投资阿富汗的门户。巴基斯坦与印度的敌对关系为中国提供了通过巴基斯坦对抗印度的战术性良机，而巴基斯坦与美国的密切军事关系需要中国谨慎管理。

斯里兰卡政府对中国友好，该国处于印度洋中心的战略位置，长期接受中国政府投资，排名第三。孟加拉国紧随其后，该国的增长潜力对中国颇具吸引力，但考虑到孟加拉国与印度关系密切，中国需要谨慎处理中孟关系。

中亚在各地区中排名第四，部分原因是该地区始终缺乏经济活力。但考虑到 SCO 的稳定作用，以及中国和欧洲通过中亚开展的贸易和基础设施联系不断增多，中亚的重要性可能会有所上升（请见北京跨欧亚国际国运代理有限公司网站，未注明日期；欧盟委员会，2021）。在中亚各国中，资源富饶的哈萨克斯坦提供了大量经济机会，专家将它排在第一，而俄罗斯（排名第二）因战略外交和军事原因占据重要地位，如前所述。考虑到 2021 年的事态发展，阿富汗的重要性源自以下两个原因：(1) 如果局势稳定，则“一带一路”可从巴基斯坦延伸至阿富汗，但 (2) 如果局势仍然不稳且试图输出恐怖主义，则可能成为中国新疆省动乱的根源。

总体而言，中国在亚洲面临的挑战似乎颇为复杂。虽然表 3.4 所示的中国与各个国家的关系分析超出了本报告的范围，但我们仍对中越关系展开了简要讨论，用以佐证这种复杂性。（我们在第四章——朝鲜半岛案例研究中更详细地讨论了各个国家所面临的具体挑战。）

正如 Vuving (2009) 所述，“在半个世纪内，中越关系的官方定义从‘同志加兄弟’（1949-1977）到‘危险的敌人’（1979-1988）再到‘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2002 以来），一路演变。”尽管出现了 1974 年的西沙群岛争端、1979 年的中越战争和 1988 年的岛屿争端，但在北越与美国支持的南越开展战争期间，中国对北越提供的支持使得中越两国的关系得以维系。1999 年和 2000 年的领土协议是中越关系发展的关键转折点。同时，与中国的情况如出一辙，越南的市场改革导致涌现出一批支持者，他们支持与资本主义西方世界进行经济一体化。

2005 年，越南与美国关系正式升温，标志着越南与中美两国的关系趋于平衡。这是因为市场整合主义者向利润丰厚的美国市场出售商品的愿望战胜了共产党的反帝倾向？是否对北京构成全新威胁？

更普遍的观点是，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在南海新采取的强硬态度会对越南构成威胁（Le Thu, 2020）。秉持着以上观点，越南通过与美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来提升国家安全实力。但这并不是越南于 2005 年向美国靠拢的原因。

相反，Vuving (2009) 认为，伊拉克战争让反帝国主义阵营相信，除非越南在安全领域和经济合作方面与美国发展更密切的关系，否则，越南将会成为下一个目标。

美国对越南摆出威慑姿态，于是越南发现，采取“中美平衡”的外交政策较为有利。印度的情况同样如此。

总之，正如一位专家所指出的那样，从中国的战略角度来看，亚洲国家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类：⁵

1. 已加入中国阵营的国家：柬埔寨、老挝、缅甸、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
2. 绝不会加入中国阵营的国家：日本、越南、印度和澳大利亚
3. 中国战略的目标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

中国阵营内的东南亚国家资源匮乏，但其中有几个国家所处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他们还为中国带来了在 ASEAN 获得赞成票的机会。⁶ 斯里兰卡虽然在经济上更为成功，在印度洋的战略位置更为重要，但却是一个发展中大国。

中国管理这些复杂的关系面临双重挑战：(1) 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无法借助影响力赢得亚洲盟友，(2) 与美国战略相比，中国大战略必须解决更多具有国家特色的挑战。

中国与亚洲各国关系如此错综复杂，是否表明中国大战略可能无法承担起这项任务？在中国想通过自身战略施加影响的亚洲国家（即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泰国和菲律宾）中，有部分尚未加入中国阵营，这便是一个尤为相关示例。我们将在第四章更加详细地探讨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开始讨论每类成果（经济、安全和外交）中包含的具体主题，以便了解中国可以制定和使用哪些国际组织性战略来解决它们（见表 3.5）。我们向专家提供了一份主题列表（如第 1 列所示），并请他们在 1（不重要）到 5（非常重要）的范围内，对中国与不同亚洲国家开展合作的过程中每个主题的重要性进行排名。评分中

⁵ 新加坡可划分到第 2 类和第 3 类。韩国与之相同，但不太可能加入中国阵营。

⁶ 目前正在进行的几个“一带一路”项目正在开发连接昆明和皎漂的基础设施，一旦完成，缅甸的位置可能会变得具有战略价值。

表 3.5

专家眼中中国目标与亚洲国家 / 地区和中国的国际组织性战略之间的对应关系

目的	关键亚洲国家 / 地区	国际组织性战略
经济		
1. 贸易和资本流动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日本 • 韩国 • ASEAN 国家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WTO • RCEP • 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协定 • 中韩自由贸易协定
2. 知识产权安全性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日本 • 韩国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WTO • RCEP
3. 设施连通性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哈萨克斯坦 • 巴基斯坦 • 泰国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一带一路”国际组织
4. 金融一体化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新加坡 • 日本 • 韩国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无可用
5. 网络安全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日本 • 北朝鲜 • 俄罗斯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无可用
安全		
1. 边境安全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北朝鲜 • 日本 • 印度 • 越南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相互友好合作条约（与 DPRK） •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越南）
2. 贸易路线安全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印度尼西亚 • 日本 • 菲律宾 • 越南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ASEAN 行为准则（正在协商）
3. 国土防卫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台湾地区 • 印度 • 北朝鲜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相互友好合作条约（与 DPRK）
4. 政策协调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日本 • 印度尼西亚 • 俄罗斯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表 3.5 - 续

目的	关键亚洲国家 / 地区	国际组织性战略
外交		
1. 环境保护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印度 • 日本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2. 健康保障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北朝鲜 • 缅甸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WHO • CIDCA
3. 民间交流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韩国 • 日本 • 印度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不可用
4. 伙伴国的政权稳定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北朝鲜 • 缅甸 • 巴基斯坦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相互友好合作条约（与 DPRK） •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缅甸） • 中巴经济走廊

注：第 2 列所列国家按专家排名的顺序排列，在 5 分制（5 表示非常重要）中，列出国家的排名评分中位数均达到 4 分或以上。

位数为 4 或更高的回答列于第 2 列。我们还请专家评论中国将采用的战略，及其是否会涉及国际组织；他们关于战略的回答请见第 3 列。

表 3.5 表明，中国愿意与亚洲多个国家开展合作，以实现期望成果。东北亚和东南亚仍然是所有（三个）成果类别中最为重要的地区。在经济和外交战略方面，中国的国际组织工具包大多具有区域性或多边性。在安全方面，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过去十年建立的双边战略伙伴关系。这些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是就伙伴关系范围、成立工作组和领导人峰会等内容达成的协议。从这个角度来看，尽管缺乏编制报告和联合声明的正式程序，导致难以评估战略伙伴关系的价值，但仍可将该等伙伴关系视为国际组织。在同日本的外交关系中，成果与国际组织性战略之间呈现出的差距最大。中日经济已高度融合，最近成立的 RCEP 可能会帮助中国与日本达成多项成果，但现在还言之过早。

总之，文献和专家提供的见解帮助我们确定了中国在处理与亚洲关键国家的关系时，采取了哪些关键的国际组织性和非国际组织性战略。与上述国家关系的复杂性表明，中国对国际组织的日益依赖并非总能带来期望成果。我们以朝鲜半岛国家为例进行研究，进一步探讨此种复杂性。

中国大战略和朝鲜半岛

朝鲜半岛适合作为测试对象，用以证明中国大战略（如第三章所述）是否在整个亚洲均行之有效，原因如下：

- **对目标国家 / 地区的借鉴意义：**如第三章表 3.5 所示，对中国有利益关系的三个成果类别（经济、安全和外交）对北朝鲜和韩国亦有利益关系。对北朝鲜而言，解除联合国的制裁是最优先的事项，这件事需要中国（和美国）的合作。北朝鲜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和经济发展的支持，中国恰恰能够提供这两项。就韩国而言，该国发现与北朝鲜建立更密切的关系符合本国利益，但这个意愿尚未实现，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十分关注北朝鲜的无核化，因此，韩国可能会从美国那里寻求更大的自治权（Snyder, 2018）。这可能会促使韩国寻求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中韩两国经济的相互依存性与日俱增，两国在协调政策方面也存在共同利益，这些都可能让建立密切关系的意愿更为强烈。
- **对中国的借鉴意义：**北朝鲜和韩国都试图修缮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这为找到与中国的共同立场带来了机遇和挑战。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将美国在韩国的军事部署视为潜在威胁，因此，设法削弱首尔与华盛顿的关系可能有助于削弱美国的安全部署。在经济方面，中国希望能与北朝鲜和韩国建立起更紧密的经济联系，原因如下。
- **中国大战略的普遍适用性：**正如在大部分亚洲国家一样，中国大战略在朝鲜半岛并非没有受到半点非议。北朝鲜和韩国以及日本和美国等外部利益攸关方都会作出反应。另外，与其他亚洲地区一样，朝鲜半岛自有其独特性，这可能需要中国制定个性化的应对计划和战略。中国在朝鲜半岛的经历可以为亚洲其他国家提供宝贵经验。

因此，我们的重点是确定中国在朝鲜半岛实施了哪些大战略，以及在有效性方面存在的潜在差距。这样我们就能够总结出中国大战略在亚洲其他地区的有效性，对于这一点，我们将在第五章进一步讨论。

韩国（又名大韩民国、ROK）和中国于 1992 年建立外交关系。考虑到美韩两国是安全盟友的事实，中国重点与韩国建立贸易关系。但是，中国也通过六方会谈等工作，在朝鲜半岛安全问题上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

过去 10 年来，中韩经济迅速融合，2014 年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更是加速了融合进程。中国持有韩国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也是韩国最大的出口目的国。

尽管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对韩国至关重要，但与北朝鲜的关系对韩国亦同样重要。在管理两国的关系时，韩国必须考虑中国在北朝鲜的利益。

在与中国的关系中，韩国处于弱势的地位，这导致其在制定对华政策方面相对缺少自主权。在制定大战略时，中小国家在自主程度上与大国存在差异。弱小权势国家的大战略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响应大国的大战略。原因在于，大国可以利用自身的主导地位，将其战略强加于弱小权势国家。当然，小国家也可能会结成联盟来增强其集体力量。反过来，大国可能会先发制人地与小国家结盟。但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小国家的自主权都不如大国。¹

中国在北朝鲜（也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DPRK）的利益十分复杂。两国于 1961 年签署了共同防御协议，直到 2021 年本报告创作之时，北朝鲜仍认为该协议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西方国家干涉其内政（Lo, 2021）。² 北京一直力图避免破坏北朝鲜稳定，但同时也支持美国于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的试图实现北朝鲜无核化的提议（Dumbaugh 和 Niksich, 2002）。³ 中国还主持并主办了 2003 年至 2007 年的六方会

¹ 以经济学文献进行类比，大国可以成为做市商，而小国永远是价格接受者。

1960 年至 1985 年，日本通过基础设施、贸易和援助战略寻求扩大地区影响力，这是一个国家在美国保护伞下仍力争保持高度自治（同时仍保持紧密的安全联盟）的典型示例。1966 年，由于美国的担忧，日本没能在世界银行中获得更多份额，于是推动了亚洲开发银行的成立，这个例子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尽管美国最初以世界银行资金充足为由反对成立亚洲开发银行，但美国后来妥协了，并与盟友合作，限制日本对亚洲开发银行的影响力。比如，将银行总部设在马尼拉，而不是像日本预期一样设在东京（亚洲开发银行，2017；Wan, 1995-1996）。

² 两国定期重申条约规定的关系。

³ 北京提供的帮助并未达到美国预期。话虽如此，北京显然并未寻求在这个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也未试图直接削弱美国的领导作用，但其力保让北朝鲜勉强维系政权生存这一现实可能已经产生了类似效果。

谈 (Huang Ming, 2008) 在习主席的领导下, 中国在 2017 年继续支持美国针对北朝鲜提出的行动计划。中国担心北朝鲜核武器和弹道导弹武器化会影响本国安全, 于是在 2013 年至 2017 年 (即奥巴马和特朗普执政期间) 对美国提出的六项制裁北朝鲜的安理会决议投了赞成票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未注明日期)。

虽然平壤的核试验和导弹试验威胁到地区稳定, 并遭到北京的反对 (Scobell 等人, 2020), 但在北朝鲜与韩国的对抗中或在韩国试图实行更严厉的制裁时, 中国经常站在北朝鲜一边, 并始终确保国际制裁不会对平壤政权构成威胁 (Albert, 2019)。中国领导人担心过度制裁可能导致金氏政府垮台, 干扰经济活动, 迫使成千上万名难民涌入中国东北省份, 还可能导致韩国军队 (可能还包括其美国盟军) 直逼中国国门 (Albert, 2019)。

如第三章的表 3.4 所示, 专家认为中国非常重视与北朝鲜的关系。在适应中国对与北朝鲜的接壤省份 (吉林和辽宁) 所采取的发展行动计划以及实现提高朝鲜半岛稳定性这个目标方面, 北朝鲜在中国对东北亚国家的外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Cha, 2016; Silberstein, 2019)。

当潜在目标趋同时, 中国对韩国和北朝鲜采取的战略更为有效, 否则便效果不佳。我们与专家讨论了中国的目标及韩朝两国的关系, 表 4.1 总结了他们对共同目的的看法。

如表 4.1 所示, 中韩两国与北朝鲜有两个共同利益: 政权稳定以及加强贸易和资本流动。首先是政权稳定, 两国都担心政权崩溃带来的后果, 包括难民流动和北朝鲜核武库的控制事宜。中国为了确保北朝鲜政权稳定, 特向其提供经济支持和人道主义援助, 并通过两国的相互友好合作条约, 长期提交外交和军事方面的支持。

关于第二个目的——贸易和资本流动, 大多数专家表示, 只要投资类型合适, 北朝鲜将十分欢迎中韩两国的投资。北朝鲜还向中韩两国寻求帮助, 以减轻国际制裁的影响。对于投资 (比如对外商独资产业的投资), 如果需要涌入大量外籍人士, 北朝鲜就会感到担忧。这会导致北朝鲜普通民众直面海外财富和生活方式的冲击, 这一点 DPRK 领导者无法接受。另一方面, 对于由外国出资建设、由外国长期有限参与、且最后移交北朝鲜管理的输电线和其他基础设施的投资, 北朝鲜十分欢迎。而“一带一路”行动计划专注基础设施建设, 北朝鲜和韩国 (自 2018 年以来) 都在其辐射范围之内, 所以是一个合适的工具。中国希望通过“一带一路”项目推动东北省份经济的发展, 因而也乐见其成。当然, 安理会目前实施的制裁国际组织暂时将这些投资排除在外。

表 4.1

中韩朝三国的共同目的

中国的目的	北朝鲜的目的	韩国的目的
对于北朝鲜	对于中国	对于北朝鲜
政权稳定	资本流动（外商直接投资）	政权稳定
边境安全	边境安全	民间交流
贸易和资本流动（包括设施连通性）	政策协调（关于制裁）	贸易和资本流动（包括设施连通性）
对于韩国	对于韩国	对于中国
贸易和资本流动	边境安全	贸易和资本流动
国土防卫	资本流动（外商直接投资）	国土防卫
政策协调（关于韩美联盟）		政策协调（关于北朝鲜）

注：我们请专家从列表中选择目的，他们也可以选择自行添加目的。此表显示了其排名靠前的目的。中国大战略的完整目的列表请见表 3.5 第 1 列。

2013 年，韩国朴槿惠政府宣布推出“欧亚行动计划”，有意在韩国北部建设基础设施、交通和能源，并有可能与“一带一路”进行对接。文在寅政府多次呼吁在朝鲜半岛建立“和平政权”，并采取了与此类似但略有调整的“新北方政策”，该政策强调了强化与俄罗斯、中国、蒙古和其他中亚国家关系的重要性。中国实体亦表示对此很感兴趣。例如，2018 年，辽宁省提议打造一个连接中国丹东市与北朝鲜平壤、韩国首尔和釜山的铁路系统，并建设一条连接丹东和平壤、贯通北朝鲜新义州市的新公路（Zhou, 2018）。

部分专家指出，韩国虽然是“一带一路”的成员，但需要权衡参与“一带一路”行动计划对自身与美国结盟产生的影响。尽管韩美联盟并未对韩国的经济自由施加任何限制，但当前中美的对抗关系可能会导致韩国对于通过“一带一路”与中国共同投资一事较为谨慎。

中国和韩国将贸易和投资作为共同的首要任务。在正常情况下，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和 WTO 机制就已足够应付这些问题。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曾向韩国政府施压，要求其减少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的依赖。在拜登政府的领导下，这种压力可能已经有所缓解——拜登和文在寅于 2021 年 5 月会晤后发布的联合声明并未提及中国（白宫，2021）。

国土防卫是中韩两国共同关心的问题，但关心的原因不尽相同。中国的担忧来自美韩联盟。在文在寅执政初期，中国反对韩国部署美国导弹防御系统——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萨德）引发了争议。北京声称，美国通过萨德雷达可监视中

国东北省份和中国中部地区，威胁到了国家安全。作为回应，中国对韩国实施了重大制裁，而事实上，在 2017 年，韩国同意不予建立三边导弹防御系统、不与美日结盟，亦不部署额外的萨德炮台时，双方本可以解决这一问题（Allen 等人，2019）。

韩国担心，北朝鲜在对抗韩国时可能会使用核武器。专家表示，韩国应对这个威胁的首要任务是支持 DPRK 发展经济，鼓励与 DPRK 进行民间交流，并帮助稳定北朝鲜政权。这三项政策比消除 DPRK 核武库或应对 DPRK 在非军事区对首尔的（重大）炮击威胁更受青睐（Gentile 等人，2019）。这或许是因为要完全实现无核化不切实际。此外，韩国正在增强自身的常规威慑能力，以应对炮击威胁（Bowers 和 Hiim，2020/21）。

两国的第三个共同优先事项是需要进行政策协调。韩国希望就北朝鲜的核威胁问题与中国进行更多协调，但这有一个前提，即中国了解威胁并能够相应采取措施。对于中国而言，政策协调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1) 防止美韩联盟再次带来问题，如萨德问题；(2) 确保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不受美国对韩国施加的压力的影响，如特朗普和拜登执政期间，美国向韩国施加压力，限制其向中国出口半导体（《环球时报》，2021）。

总之，中韩两国与北朝鲜有两个共同利益：政权稳定以及加强贸易和资本流动。两国将贸易和投资作为共同的首要任务。国土防卫是两国共同关心的问题，但关心的原因不尽相同。中国的担忧来自美韩联盟。韩国担心，北朝鲜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会对韩国造成威胁，并认为中国可以缓解这种局面。

中国和北朝鲜都担心共同的边境安全。中国担心北朝鲜出现政治或人道主义危机时难民涌入会带来极大风险，而北朝鲜则担心技术工人（包括叛逃者）非法越境。

当中方利益与伙伴国利益趋同时，中国的国际组织性战略可能比两国利益或根本原因不同时更为有效，因为在利益趋同的情况下，伙伴国更有可能同意该国际组织的标准和规则。例如，三国在贸易、资本流动和设施连通性方面拥有共同经济利益表明，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实现经济一体化的战略可能会奏效。同样，北朝鲜政权的稳定也属于双方的共同利益，这表明中国的战略，比如上述的提供经济支持和人道主义援助，以及通过相互友好合作条约长期提供外交和军事方面的支持可能也会奏效。

但是，由于各国利益不尽相同，国际组织性战略并非总能取得成功（见表 4.2）。

表 4.2 显示了中国国际组织性战略如何才能在北朝鲜和韩国发挥作用。“一带一路”带动了两国之间的贸易和资本流动。对韩国而言，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和 RCEP 日趋成为推动中韩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

表 4.2 还显示了中国在实施大战略时使用国际组织的一些局限性。在国土防卫和与韩国进行政策协调等重要领域，中国目前没有现成的国际组织可供使用，只能依靠双边谈判。⁴ 中国在反对韩国部署美国的萨德导弹防御系统时，采取的方法具有明显的弱点。由于韩国的保证与韩国现有政策保持一致，这项决议似乎主要是中国的保全体面之举，因为原来的萨德系统仍然存在。

韩国与中国经济往来密切，但韩国的安全利益更多地系于美韩联盟之上，因此，在中美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对中国大战略作出反应并非易事。虽然韩国可以实现经济关系多元化，摆脱中国，但韩国似乎并未如此作为，这一点从其仍然保留 RCEP 成员国身份可见一斑。韩国可以考虑在东北亚、东南亚或南亚加入新的联盟。但是，韩日关系历来如履薄冰，似乎排除了东北亚的可能性。东南亚部分国家（比如菲律宾和越南）克服了与中国关系中存在的障碍，这些国家与中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不太可能与韩国结盟。在南亚，考虑到印度的大国野心及其与中国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较为有限，是一个适合结盟的对象。但中印陆地边境线较长，且最近发生了低强度冲突，印度可能会极其谨慎，避免与对印度价值有限的中等国家结盟，以免激怒中国。

⁴ 目前已不复存在的六方会谈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国际组织性渠道，便于中国与韩国和其他参与国进行政策协调。

表 4.2

中国在朝鲜半岛实施的大战略

中国的目的	中国的战略	国际组织使用
北朝鲜的优先事项		
政权稳定	1. 相互友好合作条约	是
	2. 援助	否
边境安全	1. 相互友好合作条约	是
贸易和资本流动（包括设施连通性）	1. “一带一路” 国际组织	是
韩国的优先事项		
贸易和资本流动	1. 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和 RCEP	是
	2. WTO	
	3. “一带一路” 国际组织	
国土防卫	1. 双边谈判	否
政策协调	1. 双边谈判	否

注：第 1 列所示的专家排名目的与表 4.1 所示目的相同。第 2 列所示战略根据专家对中国战略的重要性所做的排名按由高至低的顺序排列。

美国也会积极参与。它鼓励韩国加大在美投资，减少与中国的技术合作，并实现经济多元化，摆脱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的依赖。在外交方面，美国强调与韩国拥有共同价值观，在安全方面，美国和韩国共同重申了联盟的持久性。在韩国看来，美韩同盟并非针对中国，而且中国成本较低、技能卓越，与中国进行经济一体化对韩国颇具吸引力，因此，美国的这些措施能否成功尚未可知。中国台湾地区的局势提供了一个警示：尽管具有与中国大陆经济“脱钩”的政治意愿，但经过五年多的努力，台湾地区并未成功实现这一目标。为什么是韩国？

结束讨论

在本报告中，我们根据文献综述和对专家进行的采访，针对中国大战略及其对亚洲的影响提供了自己的见解。我们的分析表明，中国 2021 年的大战略可以表述如下：中国大战略的长期目标是在社会经济、外交和军事领域成为亚洲首屈一指的大国，并逐渐发展成为全球大国。要实现这一目标，中国目前需要取得三项成果：(1) 加深与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一体化程度，(2) 管理与美国的竞争，以及 (3) 打造全球软实力。

2021 年的国家计划旨在实现期望成果，这些计划越来越体现出国际组织性特征，具体如下：

- 经济计划
 - FTA，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 金融国际组织
 - “一带一路”国际组织和项目
- 安全计划
 - 双边和区域安全协会
 - “一带一路”国际组织和项目
 - 通过军事行动捍卫核心利益
- 外交计划
 - 多边和区域外交协会
 - 通过坚定外交捍卫核心利益
 - 人道主义援助
 - “一带一路”国际组织和项目。

中国越来越依赖于多边、区域和双边国际组织来实现自身目的。这些国际组织包括中国参与之前业已存在的国际组织以及新国际组织。后者包括中国发起或共同推动的国际组织，有时会与现有国际组织存在竞争关系。

中国的国际组织性安全战略（如 SCO）取得了成功；但该战略的使用次数和范围都十分有限，迫使中国选择使用非国际组织性战略或经济战略作为替代方案来实现安全目标。

中国的国际组织性外交战略在全球贫穷国家取得显著成果，但中国一直在中国以南和以东的国家推行被视为胁迫的强势外交政策。这可能是由于中国未针对东南亚和东北亚制定外交和安全方面的国际组织性机制。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更为稳定，中亚国家不认为中国对它们实施了强制性外交政策，原因可能在于中国未在东南亚和东北亚地区推出类似于 SCO 的国际组织。相反，中国必须采取非国际组织性行动计划，与国际组织性行动计划相比，非国际组织性行动计划的劣势十分明显，或者，中国必须使用旨在实现其经济成果的经济举措来实现外交和安全成果。

为了帮助我们了解亚洲哪些国家会受中国大战略的影响以及这些国家可能会如何应对，我们采访了来自中国、韩国、其他亚洲国家和美国主题专家。我们对与中国利益相关的亚洲国家进行分析后得出以下结论：

- 中国希望与亚洲多个国家开展合作，以实现期望成果。东北亚和东南亚仍然是所有（三个）成果类别中最为重要的地区。
- 在经济和外交战略方面，中国的国际组织工具包中主要包含区域或多边国际组织。在安全方面，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过去十年建立的双边国际组织，通常是战略伙伴关系。
- 与上述关键国家关系的复杂性表明，中国对国际组织的日益依赖并非总能带来期望成果。在同日本的外交关系中，成果与国际组织性战略之间呈现出的差距最大。中日经济已高度融合，最近成立的 RCEP 可能会帮助中国与日本达成多项成果，但现在还言之过早。

我们研究了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的关系，进一步探讨此种复杂性。我们对三个国家共同利益的研究表明，中韩两国与北朝鲜有两个共同利益：政权稳定以及加强贸易和资本流动。中国和韩国还将贸易和投资作为共同的首要任务。

国土防卫是中韩两国共同关心的问题，但关心的原因不尽相同。中国的担忧来自美韩联盟。韩国担心，北朝鲜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会对韩国造成威胁，并认为中国可以缓解这种局面。

中国和北朝鲜都担心边境安全。中国担心北朝鲜出现政治或人道主义危机时难民涌入会带来极大风险，而北朝鲜则担心技术工人（包括脱北者）非法越境。

尽管中国与北朝鲜和韩国有多项共同利益，但中国缺乏足够的国际组织性机制来处理相关利益，因此，中国在这两个国家实施大战略时，在很大程度上会面临挑战。

对于韩国等中亚大国来说，考虑到中国的野心、经济实力及其与亚洲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中国大战略构成了重要问题。这些问题迫使这些国家不得不选择是与中国经济国际组织合作，还是实现本国经济多元化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选择接受中国的主导地位，满足安全需求，还是组建自己的联盟。

近年来，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异彩，需要其他国家（无论权势强弱）对中国大战略做出应对。亚洲国家大多是像韩国这样的中等国家，与大国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独一无二，因此往往难以简单做出应对。大国实施大战略，中小国家可能会承受相当大的后果。

主题专家抽样说明

我们采访了来自中国 (4)、韩国 (5)、其他亚洲国家 (5) 和美国 (8) 的 22 名前政策制定者和政策分析人士。抽样详情请见表 A.1。

我们抽样时有意仅选择至少具有十年相关经验的高级政策分析师和高层次前政策制定者，至少也是亚洲国家的前任大使。其中一位政策制定者担任的职位确实要低于大使级别，但之所以选择该人员，是因为他曾多次以外交官身份前往北朝鲜，能提供 DPRK 的思维角度。此外，还包括一名来自“其他亚洲国家”的政策分析师，他在提升国家多元化方面的相关经验不足 10 年。

政策分析师是从该领域资深学者的文献衍生的名单中选出。

我们的抽样方法非随机抽样，带有倾向性，但我们选择的样本包括基础样本总体的代表，确保探索性定性分析的抽样形式有效。

表 A.1
主题专家特征

国家或地区	前任政策制定者	政策分析师	总计
中国	0	4	4
韩国	1	4	5
其他亚洲国家 / 地区	3	2	5
美国	1	7	8
总计	5	17	22

术语

期望成果	国家大战略的组成部分；可与目的互换，指的是完成后有助于实现国家目标的特定的国家长期目标
经济一体化	消除商品和服务贸易壁垒，推动资本和技术的自由流动
目标	国家大战略的组成部分，是指国家的愿景声明
大战略	明确国家目标、目的和实施计划的声明；包括目标、期望成果或目的，以及工具、计划、战略和工具包
工具	国家大战略的组成部分；可与计划、战略和工具包互换，指的是实施后有助于实现期望成果或目的的国家长期计划
目的	国家大战略的组成部分；可与期望结果互换，指的是完成后有助于实现国家目标的特定的国家长期目标
计划	国家大战略的组成部分；可与工具、战略和工具包互换，实施后有助于实现期望成果或目的
软实力	通过非强制性方法塑造外界对本国政策看法的能力；软实力工具包括文化交流、公共外交、对外援助和技术合作

战略	与大战略不同，战略是 <i>国家大战略</i> 的组成部分；可与 <i>工具、计划和工具包</i> 互换，指实施后有助于实现 <i>期望成果或目的</i> 的 <i>国家长期计划</i>
工具包	<i>国家大战略</i> 的组成部分；可与 <i>工具、计划和战略</i> 互换，指实施后有助于实现 <i>期望成果或目的</i> 的 <i>国家长期计划</i>

缩写

ADB	亚洲开发银行
AIIB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NZUS	澳新美安全条约
ASEAN	东南亚国家联盟
BRI	“一带一路”行动计划
CIDCA	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
CPEC	中巴经济走廊
DPRK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朝鲜）
FDI	外商直接投资
FTA	自由贸易协定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PCC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NATO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RCEP	区域性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ROK	大韩民国（韩国）
SCO	上海合作组织
SME	主题专家
THAAD（萨德）	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
UN	联合国
WB	世界银行
WHO	世界卫生组织
WTO	世界贸易组织

参考文献

ADB - 请参见亚洲开发银行。

Al-Qahtani, Mutlaq,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nd 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上海合作组织与国际组织法],”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中国国际法论刊], 第5卷, 第1期, 2006年3月, 第129-147页。

Albert, Eleanor, “The China–North Korea Relationship [中朝关系],”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 2019年6月25日。

Allen, Gregory, Allison Astorino-Courtois, Michael Beckley, Belinda Bragg, L. R. Bremseth, Dean Cheng, Skye Cooley, Dale Copeland, Joseph DeFranco, David R. Dorondo, Anoush Ehteshami, Daniel J. Flynn, Christopher D. Forrest, James Giordano, E. J. Gregory, Robert Hinck, Maorong Jiang, Michael Mazarr, Eric McGlinchey, Girish Nandakumar, Cynthia Roberts, John Schurtz, Thomas Sherlock, Robert Spalding III, Cynthia Watson, Richard Weitz, Nicholas D. Wright, Nicole Peterson 和 Sabrina Pagano, *Chinese Strategic Intentions: A Deep Dive into China's Worldwide Activities* [中国的战略意图: 深入了解中国的全球活动], 波士顿: NSI, 2019年12月16日。

Allison, Graham,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注定一战: 美国和中国能逃脱修昔底德陷阱吗?] 纽约: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7年。

ASEAN—请参见东南亚国家联盟。

亚洲开发银行, *ADB Through the Decades: ADB's First Decade (1966–1976)* [亚洲开发银行发展史: 国家开发银行的头十年(1966–1976)], 菲律宾马尼拉, 2017年9月。

东南亚国家联盟, “About ASEAN [关于组织],” 网页, 未注明日期。截至2021年9月1日: <https://asean.org/about-us>

大西洋理事会, “About the Atlantic Council [关于组织],” , 网页, 未注明日期。截至2021年9月1日: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about/>

Azhar, Harris 和 Amna Syed, *Impact of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CPEC) on the Energy Sector of Pakistan* [中巴经济走廊(CPEC)对巴基斯坦能源行业的影响], 第3卷, *Corridors, Culture, and Connectivity* [走廊、文化与连通],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 Pakistan-China Institute [巴中学会], 2017年10月。

北京跨欧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网站, 未注明日期。截至2021年11月7日: <http://en.trans-eurasia.com/>

Bowers, Ian, 和 Henrik Stålhane Hiim, “Conventional Counterforce Dilemmas: South Korea's Deterrence Strategy and Stability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传统反击的困境: 韩国的威慑战略与朝鲜半岛的稳定],” *International Security* [国际安全], 第45卷, 第3期, 2020/21 冬季刊, 第7–39页。

Brautigam, Deborah, “A Critical Look at Chinese ‘Debt-Trap Diplomacy’: The Rise of a Meme [以批判的态度看待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 文化基因的兴起],” *Area Development and Policy* [地区发展与政策], 第5卷, 第1期, 2020年, 第1–14页。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Making Sense of UN Sanctions on North Korea [理解联合国对北朝鲜的制裁],” 未注明日期。截至2021年9月1日: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publications/interactive/north-korea-sanctions>

CEIC Data [CEIC 数据库], “China Gross Savings Rate [中国总储蓄率],” 网页, 未注明日期。截至2021年9月20日: <https://www.ceicdata.com/en/indicator/china/gross-savings-rate>

Cha, Victor D., “The North Korea Question [朝鲜问题], ” *Asian Survey [亚洲调查]*, 第 56 卷, 第 2 期, 2016 年 3 月 /4 月, 第 243–269 页。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Authority [中巴经济走廊事务局], “About CPEC: Introduction [关于组织: 介绍], ” 网页, 未注明日期。截至 2021 年 9 月 6 日:
<http://cpec.gov.pk/introduction/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 “What We Do [主要职能], ” 网页, 2021 年 8 月 1 日。截至 2021 年 9 月 5 日:
http://en.cidca.gov.cn/2018-08/01/c_259525.htm

CIDCA—请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

Clinton, Hillary Rodham, “U.S.-Asia Relations: Indispensable to Our Future [亚美关系: 对我们的未来至关重要], ” 亚洲协会发言稿, 纽约, 2009 年 2 月 13 日。截至 2021 年 11 月 7 日:
<https://2009-2017.state.gov/secretary/20092013clinton/rm/2009a/02/117333.htm>

Cordesman, Anthony H., “President Trump's New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特朗普总统的新国家安全战略], ”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2017 年 12 月 18 日。

Doshi, Rush, *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无尽的游戏: 中国取代美国秩序的大战略]*, 英国剑桥: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21 年。

Dossani, Rafiq, *Engagement with North Korea: A Portfolio-Based Approach to Diplomacy [与北朝鲜接触打出外交组合拳]*, 加州圣塔莫尼卡: RAND Corporation [兰德公司], RR-A432-1, 2020 年。截至 2021 年 8 月 1 日: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A432-1.html

Dumbaugh, Kerry 和 Larry Niksch, *Sino-U.S. Summit, October 2002 [2002 年 10 月中美峰会]*, 华盛顿特区: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国会研究处], RS21351, 2002 年 11 月 6 日。

欧洲委员会, “EU-Chin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 Milestones and Documents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 里程碑与文件], ” 网页, 2021 年 7 月 26 日。截至 2021 年 11 月 7 日:
<https://trade.ec.europa.eu/doclib/press/index.cfm?id=2115>

Freeman, Chas W., Jr.,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Game of Superpowers [美国和中国: 超级大国之间的博弈], ” National War College Student Body [美国国家战争学院] 学生演讲, Fort Lesley J. McNair, 华盛顿特区, 2018 年 2 月 8 日。截至 2021 年 9 月 1 日:
<https://chasfreeman.net/the-united-states-and-china-game-of-superpowers/>

———, “China's 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the Evolution of PRC Grand Strategy [中国的国家经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战略的演变], ” 见 David Shambaugh 编, *China and the World [中国与世界]*, 英国牛津: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第 37–60 页。

G7 UK [英国 G7 峰会], “What is the G7? [G7 介绍]” 网页, 未注明日期。截至 2021 年 9 月 1 日:
<https://www.g7uk.org/what-is-the-g7/>

Gentile, Gian, Yvonne K. Crane, Dan Madden, Timothy M. Bonds, Bruce W. Bennett, Michael J. Mazarr 和 Andrew Scobell, *Four Problem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North Korea's Expanding Nuclear Capabilities Drive a Complex Set of Problems [朝鲜半岛的四大问题: 北朝鲜不断扩大的核能力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问题]*, 加州圣塔莫尼卡: RAND Corporation [兰德公司], TL-271-A, 2019 年。截至 2021 年 8 月 1 日: <https://www.rand.org/pubs/tools/TL271.html>

《环球时报》, “US Might Force Samsung to Restrict Exports to China, but Complete Decoupling Unlikely [美国可能迫使三星限制对华出口, 但完全脱钩不太可能], ” 2021 年 5 月 21 日。截至 2021 年 9 月 6 日:
<https://www.globaltimes.cn/page/202105/1224121.shtml>

- Goldstein, Avery, “The Diplomatic Face of China's Grand Strategy: A Rising Power's Emerging Choice [中国大战略的外交面貌：崛起大国的新选择],” *China Quarterly* [中国季刊], 第168卷, 2001年12月, 第835–864页。
- , “China's Grand Strategy Under Xi Jinping: Reassurance, Reform, and Resistance [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大战略：安抚、改革和复兴],” *International Security* [国际安全], 第45卷, 第1期, 2020年夏季刊, 第164–201页。
- Hart, B. H. Liddell, *Strategy* [战略], 纽约: Praeger, 1967年。
- Holmes, James, “Can America and China Avoid the Pull of the Thucydides Trap? [美国和中国能逃脱修昔底德陷阱吗?]” *National Interest* [国家利益], 2018年10月19日。
- Huang Ming, “China'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n the Six-Party Talks, China-France Relations, etc. (Factual Record)” [中国外交部就六方会谈、中法关系等(实录)_资讯_凤凰网], *China News* [中国新闻], 2008年12月16日。截至2021年9月6日:
https://news.ifeng.com/mainland/200812/1216_17_924803.shtml
- Huy, Nguyen Ngoc, “The Confucian Incursion into Vietnam [儒家思想侵入越南],” 见 Walter H. Slote and George A. De Vos 编, *Confucianism and the Family* [儒家和儒家思想], 纽约州奥尔巴尼: SUNY Press [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 1998年7月, 第91–104页。
- Ikenberry, G. John 和 Darren Lim, *China's Emerging Institutional Statecraft—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nd the Prospects for Counter-Hegemony* [中国新兴的国际组织治国之道——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反霸权前景], 华盛顿特区: Brookings Institution [布鲁金斯协会], 2017年4月。
- Javed, Saman, “Trump Withdrawal from Missile Treaty Could Escalate US Tensions with China, Experts Warn [专家警告说, 特朗普退出导弹条约可能会加剧美国与中国的紧张关系],” *The Independent* [独立报], 2018年10月23日。
- Johnston, Alastair Iain, *Social States* [社会国家], 新泽西州普林斯顿: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2014年。
- Kastner, Scott L., Margaret M. Pearson, 和 Chad Rector, *China's Strategic Multilateralism: Investing in Global Governance* [中国的战略多边主义: 投资全球治理], 英国剑桥: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剑桥大学出版社], 2018年。
- Kennedy, Paul, *Grand Strategies in War and Peace* [战争与和平中的大战略], 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 Yale University Press [耶鲁大学出版社], 1991年。
- Kim, Victoria, “When China and U.S. Spar, It's South Korea That Gets Punched [中国和美国对打时, 被打的是韩国],” *Los Angeles Times* [洛杉矶时报], 2020年11月19日。
- King, Nathan, “US-China Comprehensive Dialogue and Its Four Pillars [中美全面对话及其四大支柱],” 中国国际电视台北美分台, 2017年11月7日。
- Kondapalli, Srikanth, “Regional Multilater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中国特色区域多边主义],” 见 David Shambaugh 编, *China and the World* [中国与世界], 英国牛津: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20年, 第313–340页。
- Kraus, Charles,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70 Years Later [70年后的中苏联盟],” Wilson Center, 2020年2月12日。
- Kwok, Andrei O. J. 和 Sharon G. M. Koh,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Its Impact on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东南亚的经济一体化: 对商业环境的影响],”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ducation* [国际商务教育杂志], 第12卷, 2017年, 第309–320页。
- Lanteigne, Marc,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lternate Paths to Global Power* [中国与国际组织: 通往全球大国之路], 伦敦: Routledge, 2005年。

- Le Thu, Huong, “Rough Waters Ahead for Vietnam-China Relations [越中关系面临风浪], ”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2020 年 9 月 30 日。
- Lee, John, “Killing Chimerica [消灭中美国], ” *The Interpreter*, 2018 年 10 月 19 日。
- Liu, Xin, “What Makes Russia an Important Player in BRI? [俄罗斯缘何能成为“一带一路”的重要参与者]” *The Point*, 2019 年 5 月 1 日。
- Lo, Kinling, “China, North Korea Reaffirm Ties on Defence Treaty Anniversary [中朝两国在《防卫条约》周年纪念日重申关系], ” 《南华早报》, 2021 年 7 月 11 日。
- Long, Guoqiang, “China's Policies on FDI: Review and Evaluation [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审查与评估], ” 见 Theodore H. Moran, Edward M. Graham 和 Magnus Blomström 编,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Promote Development?* [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发展吗] 华盛顿特区：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全球发展中心国际经济研究所], 2005 年 4 月, 第 315–336 页。
- Lukin, Alexander, “Have We Passed the Peak of Sino-Russian Rapprochement? [我们是否已走过中俄和解的高峰]” *Washington Quarterly* [华盛顿季刊], 第 44 卷, 第 3 期, 2021 年, 第 155–173 页。
- Lum, Thomas, *Human Rights in China and U.S. Policy: Issues for the 115th Congress* [中国人权与美国政策：第 115 届美国国会面临的问题], 华盛顿特区：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国会研究处], 2017 年 7 月 17 日。
- Makinda, Samuel M., “Sovereignt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hallenges for the United Nations [主权与国际安全：联合国面临的挑战], ” *Global Governance* [全球治理], 第 2 卷, 第 2 期, 1996 年, 第 149–168 页。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习近平主席发表重要演讲, 提出和中亚联手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 ” 2013 年 9 月 7 日。截至 2021 年 9 月 20 日：
https://www.fmprc.gov.cn/mfa_eng/topics_665678/xjpfwzysiesgjtfhshzzfh_665686/t1076334.shtml
- , “2021 年 6 月 10 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 ” 2021 年 6 月 10 日。截至 2021 年 9 月 20 日：
https://www.fmprc.gov.cn/mfa_eng/xwfw_665399/s2510_665401/t1882905.shtml
- Nedopil, Christoph, *China's Investments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2020: A Year of COVID-19* [中国 2020 年丝绸之路行动计划投资：新冠疫情下的一年], 中国北京：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 2021 年 1 月。
- North, Douglass C., “Institutions [国际组织],”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经济展望杂志], 第 5 卷, 第 1 期, 1991 年冬季刊, 第 97–112 页。
- 巴拉克·奥巴马,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at the U.S./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总统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的致辞], ” 华盛顿特区, 2009 年 7 月 27 日。截至 2021 年 11 月 7 日：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realitycheck/the-press-office/remarks-president-uschina-strategic-and-economic-dialogue>
-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S.-China Trade Facts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美贸易事实], ” 未注明日期。截至 2021 年 9 月 6 日：
<https://ustr.gov/countries-regions/china-mongolia-taiwan/peoples-republic-china>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the Global Trade, Investment and Finance Landscape [中国在全球贸易、投资和金融领域的“一带一路”行动计划], ” 见 *OECD Business and Finance Outlook 2018* [经合组织 2018 年商业和金融展望], 法国巴黎：OECD Publishing [OECD 出版社], 2018 年。
- 美国国务院政策制定人员, *The Elements of the China Challenge* [中国挑战的要素], 华盛顿特区, 2020 年 12 月。

Posen, Barry R., “Command of the Commons: The Military Foundation of U.S. Hegemony [公共事务指挥部：国际安全],” *International Security*, 第 28 卷, 第 1 期, 2003 年夏季刊, 第 5–46 页。

Prime, Penelope B., “China Joins the WTO: How, Why, and What Now? [中国加入 WTO: 如何加入、为何加入、现状如何]” *Business Economics* [商业经济学], 第 37 卷, 2002 年 4 月, 第 26–32 页。

Rajah, Roland, Alexandre Dayant 和 Jonathan Pryke, “Ocean of Debt? Belt and Road and Debt Diplomacy in the Pacific [债务之洋? “一带一路”与太平洋债务外交],” Lowy Institute [罗伊研究所], 2019 年 10 月 21 日。

Ravelo, Jenny Lei, “DevExplains: Chinese Aid [DevExplains: 中国援助],” Devex, 2017 年 8 月 17 日。

Rolland, Nadège, “A Concise Guide to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一带一路”行动计划简明指南],”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 2019 年 4 月 11 日。

Rudyak, Marina, “The Ins and Outs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 [中国国家国际开发署的内情],”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2019 年 9 月 2 日。

Sargent, Matthew, *Mapping Cross-Border Business Network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绘制亚太地区跨境业务网络], 加州圣塔莫妮卡: RAND Corporation [兰德公司], RR-A792-1, 2021 年。截至 2021 年 11 月 18 日: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A792-1.html

SCO—请参见上海合作组织。

Scobell, Andrew, Edmund J. Burke, Cortez A. Cooper III, Sale Lilly, Chad J. R. Ohlandt, Eric Warner 和 J. D. Williams, *China's Grand Strategy: Trends, Trajectories, and Long-Term Competition* [中国大战略: 趋势、轨迹与长期竞争], 加州圣塔莫妮卡: RAND Corporation [兰德公司], RR-2798-A, 2020 年。截至 2021 年 9 月 6 日: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2798.html

上海合作组织, “关于组织,” 网页, 未注明日期。截至 2021 年 9 月 9 日:

http://eng.sectsc.org/about_sco/

Sibii, Razvan, “Grand Strategy: Government Planning [大战略: 政府规划],” *Britannica*, 未注明日期。截至 2021 年 9 月 5 日: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grand-strategy>

Silberstein, Benjamin Katzeff, “The North Korean Economy, August 2019: Why China Will Continue to Dominate [2019 年 8 月北朝鲜经济: 中国为何能占据主导地位],” *38 North* [北纬 38 度网站], 2019 年 9 月 10 日。

Silove, Nina, “Beyond the Buzzword: The Three Meanings of ‘Grand Strategy’ [超越流行词: ‘大战略’的三重意义],” *Security Studies* [安全研究], 第 27 期, 第 1 卷, 2018 年, 第 27–57 页。

Snyder, Scott A., *South Korea at the Crossroads: Autonomy and Alliance in an Era of Rival Powers* [处在十字路口的韩国: 大国竞争时期的自治与结盟], 纽约: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亚洲安全事务专家, *U.S.-China Counterterrorism Cooperation: Issues for U.S. Policy* [中美反恐合作: 美国政策的问题], 华盛顿特区: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国会研究处], RL33001, 2010 年 7 月 15 日。

UN—请参见联合国。

联合国, “Security Council—Quick Links: Veto List [安理会 - 快速链接: 投票清单],” 网页, 2021 年 10 月 22 日。截至 2021 年 9 月 20 日:

<https://research.un.org/en/docs/sc/quick/veto>

美国人口普查局, “Trade in Goods with China [与中国的货物交易], ” 2001–2021 数据表, 未注明日期。截至 2021 年 9 月 1 日:

<https://www.census.gov/foreign-trade/balance/c5700.html>

美国国防部,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harpening the American Military's Competitive Edge* [美利坚合众国 2018 年国防战略概要: 提高美国军队的竞争优势], 华盛顿特区, 2018 年。

U.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oration, *Starting Strong: A Report on DFC's First Year* [强势开端: DFC 第一年报告], 2020 年年度报告, 华盛顿特区, 未注明日期。

Vuving, Alexander L., “Grand Strategic Fit and Power Shift: Explaining Turning Points in China-Vietnam Relations [大战略契合和权力转移: 解读中越关系转折点], ” 见 Shiping Tang, Mingjiang Li 和 Amitav Acharya 编, *Living with China: Regional States and China Through Crises and Turning Points* [与中国共存: 经历危机和转折点的区域国家和中国], 英国伦敦: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年 1 月, 第 229–245 页。

Walt, Vivienne, “Boxed In at the Docks: How a Lifeline from China Changed Greece [困在码头: 来自中国的生命线如何改变希腊], ” *Fortune* [财富], 2019 年 7 月 22 日。

Wan, Ming, “Japan and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日本和亚洲开发银行], ” *Pacific Affairs* [太平洋事务], 第 68 卷, 第 4 期, 1995–1996 年冬季刊, 第 509–528 页。

Wang, Jisi, “China's Search for a Grand Strategy: A Rising Great Power Finds Its Way [中国大战略摸索: 崛起的大国找到自己的出路], ” *Foreign Affairs* [外国事务], 第 90 卷, 第 2 期, 2011 年 3 月 /4 月刊, 第 68–79 页。

白宫, “U.S.-ROK Leaders' Joint Statement [美韩领导人联合声明], ” 华盛顿特区, 2021 年 5 月 21 日。

Wit, Joel, *The United States and North Korea* [美国与北朝鲜], 华盛顿特区: Brookings Institution [布鲁金斯协会], 2001 年 3 月 15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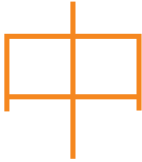
新华社, 《一带一路载入党章》, 2017 年 10 月 24 日。截至 2021 年 9 月 20 日: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7-10/24/c_136702025.htm

Zheng, Sarah, “US-China Ties: Competition, Not Engagement from Now On, Kurt Campbell Says [Kurt Campbell 眼中的中美关系: 从现在开始, 是竞争, 而非交往], ” 《南华早报》, 2021 年 5 月 27 日。

Zhou, Laura, “China Pushes for New Road and Rail Links to North Korea—and Beyond to the South [中国推动新的公路和铁路连接北朝鲜以及更远的南方], ” 《南华早报》, 2018 年 9 月 14 日。

Zucker, Lynne G., “Organizations as Institutions [组织即国际组织], ” *Research in the Sociology of Organizations* [组织社会学研究], 第 2 卷, 第 1 期, 1983 年, 第 1–47 页。



中国经济飞速增长，伴随而来的是中国在地区和全球抱有更大的目标。中国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实现雄心壮志，包括推动制定新的行动计划和国际组织。近年来，中国选择推动或积极参与大量全新国际组织和行动计划，这表明，中国的大战略已经发生了演变。

其中几个行动计划或许能够实现多项成果。例如，耗资万亿美元的“一带一路”行动计划走廊除了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资金外，还可以让中国经济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如果目前主要的海上运输路线因战争而被封锁，中国仍然可以通过其陆地走廊将货物运输到亚洲和欧洲。中国的区域和全球雄心现已往提升技术、外交、文化和军事实力方面扩展。

在本报告中，作者综述了有关中国大战略、国际组织使用情况及其将亚洲视为重心的相关文献。作者综合考虑政策专家的意见，进一步讨论了中国在与自身利益相关的亚洲国家实施大战略时的国际组织使用情况，并以朝鲜半岛国家为例进行了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表明，中国主要利用以国际组织为基础的战略来加深与北朝鲜和韩国的经济一体化程度。中国同时使用国际组织性和非国际组织性行动计划管理其在朝鲜半岛与美国的竞争关系，并打造软实力。